

第六章

参加东北内战

抗日战争纪念馆
www.krzzjh.com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h.com

— 奉派去东北

然而，就在刚刚经历了八年艰苦抗战、并蒙受了惨重牺牲的中国人民尚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时，蒋介石先生却在积极准备消灭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摘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内战的阴云又重新笼罩在我们这块战争创伤未及愈合的国土上。

日寇正式宣布投降后不久，国民党方面一面命令在各个敌后沦陷区坚持抗敌斗争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一面以政府“接收”为名，在美国海空军的大力支援下，迅速将大批精锐部队由大后方源源运往东南、中南、华北各省，并积极准备从苏联手中接收东北。中共方面当然不肯屈服，双方遂在陇海路、平汉路、平绥路沿线频频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内战的危机空前严重起来。

1945年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后的全国和平，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应邀飞赴重庆，与蒋介石等国民党高级人士举行了闻名中外的“重庆谈判”，共商战后的和平大计。经过国共双方四十天左右的艰苦谈判，终于在这一年的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重庆谈判虽未在整编军队、确认中共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等重要而敏感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但双方还是同意共同坚持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国民党方面亦表示愿意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以及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等等。这样，在内战阴云密布的天空中，开始透出一线和平的阳光，不少善良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以为可怕的内战总算可以避免了。

令人遗憾的是，后来的事态发展使人民再次失望了。事实证明，所谓的和平气氛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烟幕。实际上，即使在重庆谈判期间，国共双方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就从未中断过。国民党内部的一些高级决策人士，也从未放弃过使用武力最终解决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打算。因此，“双十协定”签订后不久，国内的政治、军事局势再度紧张起来，国共双方争夺原沦陷区各战略区域的战斗逐步升级，一场全国性的内战爆发在即。

我在内战爆发之初，心中就是怀有深深的忧虑的。本来，对于战后国共两党可能发生的矛盾和摩擦，我曾有所预料，却未想到双方的冲突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严重。理智告诉我，战后国家的当务之急应是休养生息，与民更始。一旦打起内战，必使国无宁日，黎民再受战乱之苦，民族也将失去振兴希望，因此我是不希望发生这样一场于国家民族有害而无益的战争的。再者，多年来我同共产党人既做过朋友，也打过仗，深知对方的力量 and 影响非寻常可比，故对国民党有无把握在军事上彻底摧垮共产党持怀疑态度，担心将来的局面难以收场。总之，当时我对同共产党

打仗是信心不足的。不过，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国共两党间的内战势所难免，万一仗打起来，我作为蒋先生的亲信学生和深受他器重的将领，该怎么办呢？参加内战，骨肉残杀，我于心不忍；置身于内战之外，则是对“党国”不忠。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困难的抉择。

那一时期，我经常往还于上海、南京两地，虽公务无几，私下里却紧张地注视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大约10月20日左右，报纸上的一则消息引起了我的极大关切。消息说，我的挚友杜聿明将军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即日内将赴往履新。在这之前，我已知道蒋介石先生任命了熊式辉将军为东北行营主任，并调集第13军、第52军两个军的兵力，准备向先期占领榆关、锦州一带的共产党军队进攻，进而从苏军手中接收整个东北。

杜将军同样是一位深受蒋先生信任和倚重的将领，素以对蒋先生忠心耿耿和办事大胆、果断著称。不久前，他刚刚因以武力逼龙云先生离开云南一事受到“撤职查办”处分^①，我想到这次发表有关杜氏的新任命不仅仅是蒋氏对他的安抚，同时也表明国民党决心以武力夺取东北。当时我虽然对国民党政府根据中苏条约，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抱有希望，但亦觉得中共方面是不好对付的，不禁很为我

① 日寇正式宣布投降后，蒋介石命令云南省主席龙云将所属滇军主力派往越南受降。同时密令昆明防守总司令杜聿明乘机以武力逼迫龙云放弃在云南军政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以后，蒋介石为平息龙云的不满，被迫将杜聿明“撤职查办”。

的这位老朋友担心。不过，我真没有想到以后因为杜将军的关系，自己也卷入到东北内战中去了。

半个多月后的一天，我们得悉杜聿明将军于当日率长官部人员经上海飞赴东北，我与张雪中等第3方面军高级将领特地赶到虹桥机场迎接。将近中午，杜的专机在机场上徐徐降落。不一会儿，机舱门打开，杜氏身着笔挺的军装，足登长统马靴，笑呵呵地率先走下飞机，与等候在舷梯旁的我和其他将领们热情地握手。望着他那副精神抖擞的样子，我不禁打趣道：“光亭兄真是春风得意呀！”杜氏一边笑着应道：“哪里，哪里，”一边快活地与周围的人们打招呼，开玩笑。

在机场的小会议室内坐定，大家彼此寒暄了一阵，渐渐地把话题扯到杜氏赴东北的使命上来。杜氏显出踌躇满志的样子，很自信地说：“目前时局对我们大为有利，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我们在短期内收复东北看来已无问题。兄弟不久前专门拜会过盟国（指美国）第7舰队司令金开得将军，他已答应派军舰帮助我们向东北输送军队。只要美国朋友帮助我们解决了运输问题，这样在军事上迅速战胜东北共军就更有把握了。”杜氏的话像一付兴奋剂，使在场的人们都活跃起来，纷纷表达自己对时局的见解。

我对今后时局的看法远非乐观，但碍于众人在场，有话亦不便明说，可心里又很想知道我的这位老朋友心中的主张，乃委婉地问道：“国共两党间的战争也许只是迟早的事情了。不过，目下有人认为应对此持慎重态度。理由是过去在江西时，共产党仅有区区数万之众，我们围剿了儿

年尚不能消灭，今日他们已拥有百万武装，倘一旦内战重起，我们不一定能稳操胜券。不知光亭兄对今后整个时局的看法如何？”杜将军闻言微微一笑，语气轻松地说：“共产党的力量当然不能忽视。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现在仗打起来，绝非当年江西的情况可比。如今我们拥有几百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再加上美国朋友的全力支持，整个形势都将对我们有利，只要认真、慎重地指挥作战，打败共军不是不可能的。”稍顷，他又提高声调说：“共党势力若不早除，今后必为根本祸患。为‘党国’长远利益着想，即使为此冒些战争风险也在所不惜。最近委座曾当面向兄弟训示，将以最大努力，采用一切手段，务必实现国家军令、政令之统一。委座决心既定，我辈军人惟有服从命令，其他也就不能多计了。”众人皆点头称是，我虽然远未消除胸中忧虑，但也似乎从杜氏乐观的态度中受到了一些感染。

谈着谈着，不觉飞机起飞的时间到了，我和第3方面军的将领们一直将杜将军一行送上飞机。登机前，杜氏乘人不注意，悄悄碰了一下我的臂肘，低声说：“喂，桂庭兄，我看你在这里也无甚事可干，不如屈就一下到东北去罢，我们也好再度共事喽！”我对杜氏的这个提议毫无精神准备，一时不知如何答对，只得含糊应道：“慢慢再说吧，我恐怕也帮不了你什么忙。”杜氏含笑道：“你若想来，可随时告诉我，委员长那里由我去讲。”言未毕，其他将领相继走过来与他握别，我们的“私房话”只好中止了。

杜将军走后，我出于对老朋友的挂念，十分关注东北的情况。至11月中旬，国共双方在东北的战争揭开了序幕。

11月16日，杜聿明将军指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山海关，继而又连克绥中、兴城、锦西、锦州等城。1946年元月5日，国共两党虽然达成了停战协定，但国民党方面坚持停战范围不包括东北地区，反而又将号称五大主力之二的新1军、新6军以及第71军等部队相继空运东北，进一步加强在东北的军事力量。不久，第13军等部在杜将军指挥下向北进攻，占领了义县、阜新、彰武和锦承路上的北票、朝阳、叶柏寿、凌源、建平、平泉等地。在此前后，另一路国民党军队也攻占了北镇、黑山、盘山、营口（不久复失）等地，并派出第52军25师进驻沈阳铁西区，准备从苏军手中接收沈阳。

大约在2月中旬，正当国民党军队于东北频频“得手”之际，忽然有消息说杜聿明将军因患肾病不能视事，已被迫秘密赴北平就医。我知道杜氏素有肾疾，却未料到短短几月之间，他就病得如此严重。正焦急挂念间，却接到了杜氏发给本人的一封急电。电文大意是：他因病势沉重，不得不去北平就医。目前东北战事正急，军中一日不可无帅，他已向蒋委员长保荐我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职务，望我念同学手足之谊，切勿推却，并速往北平与他一晤。

杜将军的这封急电使我踌躇再三，这才意识到对是否参加内战这个原来就感到很困难的抉择，现在必须做出决断了。我闭门苦思了几天，思想斗争很激烈。对于到东北去同共产党打仗，直接介入内战纷争，我的确缺乏信心，而且也有些不大情愿。可反过来又想，既然国共两党迟早要

打仗，那么我作为国民党一方的高级将领，只要在政治上效忠于“党国”事业，恐怕很难回避这场战争。再者，杜光亭与我两度同学，抗战中又是患难之交。他在困难中请我帮忙，倘若推脱，亦显得不够朋友。因此从这个“公”情私谊的角度上看，我又觉得去比不去好。况且我在抗战期间指挥过的新1军、新6军现在均在东北，第52军等部队中也有许多我往日的旧部和同事，故在处理人事关系、掌握兵权上也强似在汤恩伯将军手下做事。至于将来国共两党胜负如何，人民怎样承受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灾难等等恼人问题，我个人也左右不了，还是让“领袖”和“政府”去考虑吧！就这样，我冥思苦想的结果，下了一个后来使我懊悔不已的决心：接受杜光亭的邀请，到东北去。

主意即定，我便向汤恩伯将军请了假，于2月20日由上海飞抵北平。一下飞机，我顾不上休息，马上驱车进城前往位于白塔寺附近的中和医院。当时杜聿明将军就在这家医院里治病。

我来到病房时，杜氏正在熟睡。引我进来的女护士欲唤醒他，被我阻拦住了。我关切地俯身察看了一下杜将军的病容。看上去他的病确实不轻，脸色憔悴、腊黄，身体也更加瘦弱，已全然不是三个多月前在上海虹桥机场与我见面时的那付神采飞扬的样子了。护士在一旁轻声告诉我，杜氏患的是肾结核病，已经非常严重，必须实施手术切除左肾，手术结果如何亦难预料。现在他不能下床行走，只好终日躺在病榻上休息。

过了片刻，也许是因为我们在旁轻声说话，杜将军从

睡梦中醒来了。他睁眼一看是我，马上高兴地挣着要坐起来，我赶紧趋前几步，扶他躺下，然后紧紧握住他的双手，顺势坐在床侧。杜氏快活地说：“哎呀，桂庭兄，你总算来了，我盼你盼得望眼欲穿哟！”我见他病成这个样子，虽不免心中难过，但嘴上还是好言安慰他。杜将军对自己的病情倒还坦然，他说估计要到3月份才能实施手术，蒋先生特地批准将他的母亲、夫人及孩子接到北平照护，等等。

待病房里只剩我们俩人时，杜将军迫不及待地将谈话转入正题。他神色焦虑地说，现在东北战事正处于关键时刻，一旦因他病倒而影响战局，将可能失去收复东北的绝好时机，这样也对不起蒋先生。他恳切地再三希望我到东北去，帮助他指挥作战，并在他的病万一不治时，替他担负起全部重任。我对他所给予的信任十分感动，劝慰他安心养病，同时郑重表示，只要蒋委员长批准，我可以立即去东北指挥作战。杜氏见我态度明确，重又露出高兴的样子，甚至还说了几句玩笑。

接着，杜将军将东北国共双方军队的作战情况及国民党方面的内部经理人事等都一一向我作了详细介绍。

杜氏在谈话中很坦率地告诉我，东北解放军的力量比他原来预料的要强得多，作战亦相当艰难，要我思想上对此做好准备；切勿轻敌。不过，他对整个东北军事形势的估计还是乐观的。他认为，从目前看，东北解放军人数较少，装备低劣，在东北又尚未立足稳固，群众基础不如关内好；而我方军队装备精良。新1军、新6军等部队正陆续空运至东北，在人数上也略占优势，因此只要果断地展

开全面进攻，是有把握收复东北的。

谈到国民党方面在东北的内部情况，他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注意争取人心。大多数官员都把去东北看作是抢肥缺、发横财，一时贪污舞弊成风，这样下去迟早会失去民心。另外还使他非常头痛的是，大大小小的军政官员蜂拥至东北，造成内部成份复杂，矛盾重重，相互争权夺利而不顾“党国”大计的事情时有发生。他举出许多这类事例，其中特别提到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将军事先不与他打好招呼，竟抢先于去年12月空运刚刚由伪军收编的保安第二总队刘德溥部至长春接收，使前去欢迎“中央军”的长春民众大失所望。言辞间多有不悦之色。类似这些事情我在上海已见了不少，想不到东北也是如此，的确让人忧心忡忡。

杜将军还对我谈起同苏军的交涉问题。据他介绍，蒋介石先生和熊式辉将军最初都希望根据中苏条约的有关规定，从苏军手中顺顺当当地把东北接收过来。为此他曾奉蒋氏之命，偕参谋长赵家骧将军及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先生飞赴长春与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商洽。对方本已同意我军接收，甚至答应掩护我军在营口登陆，但以后却在未通知我方的情况上撤出营口等城市，解放军乘机抢先占领了这些地区。杜氏愤愤地说：“俄国人是靠不住的，今后收复东北只能指望美国朋友的帮助。”不过，他还是告诫我，目前沈阳、旅大等城市尚在苏军手中，我们应避免刺激苏方。他已下令第52军25师做好准备，等苏军一撤出沈阳，我军立即跟进接防，勿使沈阳这座名城先落入共军之手。

杜将军最后谈到对熊式辉将军的看法。他认为熊氏为人一般尚好。其人长处是阅历丰富，长于谋略，缺点是遇事不够果断，常常变更主张。杜氏强调说：熊氏虽作为东北国民党最高军政长官而掌有党政军大权，但在军事上则主要由长官部负责。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希望我去东北后，在军事指挥上多负些责任。我考虑自己对东北的情况尚不了解，况且又不愿一去即给人造成与熊氏不和的印象，乃向杜表示，今后在作战方面，仍按熊、杜二人共同拟定的部署进行，但杜氏病愈前的实际指挥亦需熊主任担当主要责任，我则努力从旁协助。至于重大军事问题和军队人事变动，我一定要在征得他们二人的一致意见后再执行。杜氏闻言点点头，未再说什么。这次谈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直到天色将晚，我才告辞。

我在北平仅逗留了二、三天，其间又与杜将军晤谈了两次，内容多涉及军事问题。我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故两次谈话的时间都很短。

大约在2月22日，我接到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发来的急电，要我迅速去南京参加高级军事会议。第二天我便由北平直接飞往南京。临行前，杜将军担心蒋介石先生在东北的人事安排上另有考虑，一面嘱我当面向蒋介石先生转达他的意见；一面再次电请蒋介石先生尽快发表对我的任命。

我飞抵南京时，各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已陆续云集到这里，我预感到在这次会议上可能要做出什么重大的决策。果然，这次军事会议是国民党方面发动全面内战的总动员，充满了战争的火药味。蒋介石先生在会议上发表了言辞激

烈的讲话。他指责共产党方面没有和平诚意，处处破坏政府接收，抢占地盘。并强硬地声称，为确保中央政府的军令、政令统一，他已决意不惜采用武力来解决中共问题。蒋先生在讲话中再三强调，今后的剿共战争将关系到国民党的生死存亡，倘共产党将来一旦得势，我们将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等等。随后，何应钦将军又就全国各大战区的剿共军事问题进行了具体部署。发动反共战争的气氛一时甚嚣尘上。

会议期间，我单独去见蒋先生，向他面陈了杜将军的意见。蒋氏的态度出乎意料地干脆，他说：“杜长官的几封电报我都知道了。已经决定派你去东北，你不必等任命发表，会议结束后即可先行到锦州视事。”随后，他又就收复东北的一些具体问题，做了一番交代。

南京高级军事会议结束后，我又分别拜访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将军等人。在何、白那里不过是礼仪性拜访，唯顾将军是与我私谊甚好的老长官，故交谈的内容比较深入。顾氏对即将发动的全国规模的剿共战争表现出很大的信心，以为凭借“国军”的强大武力和美国人的支援，短期内即可解除中共的武装。对于我流露出的对内战的一些顾虑，他显得颇不以为然。顾氏与在东北的熊式辉将军是朋友，所以自然也将熊氏的一些情况一一向我做了介绍。他对熊式辉的评价，大致与杜将军相同。

由南京匆匆飞返上海后，我很快将军务及家事交代完毕，3月初旬便由上海直接飞抵东北行营及长官部所在地锦州。从此，我便卷入到东北内战的泥潭中。

二 进占沈阳前后

一到锦州，我马上拜会了熊式辉将军。我与熊氏以往没有共过事，对他不甚熟悉，考虑到今后自己在东北做事，能否协调好与熊氏及东北行营的关系是个重要因素。因此相见之下，我除了说些仰慕之类的话，还诚恳地表示要好好服从熊主任的领导，军事上也请他多指点。熊氏显然对我的这个态度非常满意，脸上立刻堆起笑容，连声说：“这个好说，这个好说，只要大家同舟共济，必能不负委座厚望，早日收复东北！”

当天晚上，熊氏在他的官邸设宴为我接风。出席作陪的除了行营的几位高级幕僚，还有长官部参谋长赵家骧将军等人。席间，大家一面慢慢饮酒，一面漫谈几个月来东北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情况。熊将军一人说话最多，他借古喻今，谈笑风声，极力描绘他在东北的“功绩”和今后局势的乐观前景，仿佛整个东北指日可下，气态颇为自得。周围的几位幕僚也在一旁不停地随声附和着。我不由地想到杜将军在北平一再说过的“今后在东北与共军作战切勿轻敌”的话，感到他们对共产党军队的力量估计不足，对形势的看法也过于乐观。因此尽管想到自己初到，对情况尚不甚了解，但还是忍不住插上一句：“依兄弟之见，自榆

锦战斗以来，共军虽累遭挫败，但主力尚存。且共军作战向来机动灵活，不事死守，加之东北区域广大，更使其有回旋余地，今后欲剿灭共军，困难恐怕不少，我们最好多从坏处着眼，切忌骄傲轻敌。”熊将军和众幕僚本来借着酒兴正说在兴头上，经我如此一说，不免有些尴尬。赵家骧将军在一旁赶紧打圆场道：“我军实力强大，再加上熊主任雄才大略，收复东北当无问题。不过郑副长官的话也十分有理，共军作战狡猾多端，我们必须多加提防，否则难免要吃大亏。”熊氏也顺势哈哈笑道：“桂庭兄说的对呀，自古骄兵必败，对今后东北时局的发展，必须要有充分估计，切勿大意！”于是大家欢笑如初，复开怀畅饮，很晚方散。

第二天，熊式辉将军召集东北行营及保安司令长官部的部分高级将领和幕僚开会。会议的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确定我军下一步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二是讨论如何应对即将到东北来的国共停战三人小组问题。

当时据我们掌握的可靠情报表明，苏军很可能在近日内撤出沈阳。我们研究决定，按原部署着驻于沈阳铁西区的第52军25师，密切注意苏军动向，一俟苏军撤出，该师应迅速接管沈阳防务。待沈阳接收后，再派出新1军等精锐部队沿中长路向铁岭、开原前进，以占领四平街、及长春、永吉为作战目标。同时，命令新6军等精锐部队分别由辽中、盘山等地进占辽阳、鞍山、海城、本溪等各重要城市，以作为拱卫沈阳的屏障。至于已占领朝阳至平泉一带的第13军，主要任务则是掩护北宁路西侧的安全，并做进攻承德的准备。

在讨论上述军事行动过程中，我以秀水河子战斗的教训为例^①，一再强调各部要集中使用兵力，注意协同作战，互相策应，切忌轻敌冒进。但事实上当时诸将领均程度不同地存在轻敌思想，我的这些话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

在讨论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争论激烈。熊将军为此亦大伤脑筋，他认为这个时候国共停战三人小组到东北来，对我方很不利，搞不好会妨碍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共产党方面也可能乘机大造舆论。会上，有人主张，既然我们坚持“东北区域不在军事调处范围之内”的主张，则可据此干脆拒绝三人小组到东北来。但更多的人认为，若采取强硬拒绝的态度，对我方的社会舆论和观感均很不利，也无助于取得美国更多的同情和援助。莫若采取“拖”的办法，力争三人小组缓来为好。

由于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只好暂时休会。以后，熊将军又专门为此接连召开几次会议，经过反复研究、权衡，最后还是基本采纳了后一种意见。我们的方针大致是：乘三人小组未到东北之前，尽可能扩大占领地区，首先要控制铁道沿线的重要城市，造成既成事实，以便将来进行停战谈判时，使我方处于有利地位。

3月13日，苏军果然撤出沈阳，第52军即于当天相继全部进入沈阳市。南面进占浑河铁桥；北面攻占北陵飞机

① 1946年2月14日，东北解放军集中一个师又一旅的兵力，在彰武、法库间的秀水河子，一举包围歼灭了轻敌冒进的13军89师一个团。

场，并以汽车输送该军第2师4团向解放军驻地山梨红屯进攻而占领之，另此一部攻占八家子。同时，新1军50师亦进占沈阳西之平安堡。

3月16日前后，东北行营及保安司令长官部由锦州移驻沈阳。此后，国民党军队以沈阳为中心，积极准备向沈阳以南、以东、以北地区展开进攻。3月22日，第52军占领抚顺，新1军占领铁岭，新6军占领辽阳。至此，沈阳外围的重要城市，除本溪外几乎均为国民党军所控制。

东北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节节“进展”，更加助长了相当一部分将领们自榆锦作战以来滋生的轻敌观念。我意识到这种思想在军事上的危险性，乃利用各种机会反复告诫诸将领戒除轻敌观念，提出要稳妥指挥、谨慎作战，并亲到各部巡示，检查作战部署。不过，说实话，当时包括熊式辉将军、杜聿明将军和我在内，对于后来东北战局的严峻性，也都是估计不足的，至于国民党军队连同我们本人最后在东北所遭到的惨败，则更是始料未及的了。

这一期间，我虽然代理长官部司令长官职务，但诸如重大军事部署和部队调动等问题，实际上都是由熊将军最后决定。熊氏对我也很客气，以后甚至有某种不寻常的信任，凡有重要事情均来找我商议，我们俩人的共事关系一直比较融洽。

我们到沈阳不久，国共停战三人小组就来了。熊式辉将军对于三人小组的到来，表现得很紧张。他在自己的官邸里召集部分高级将领会议，研究参加三人小组第一次会议的对策。在会议中，他提出许多假设的方案，要大家讨

论。我记得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一）凡我军暂时不派兵去占领的地区（如离交通要道较远的海龙等），或我军兵力比较薄弱，有被解放军消灭的可能的地点，就主张派出三人小组；（二）如果中共方面坚持要在战略要地派出三人小组时，就用种种理由把三人小组的驻地摆在远离前线的地点，如中长路的三人小组，摆在远离四平街前线的开原。那天会议开得时间很长，散会后，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赵家骧将军即于深夜出席停战三人小组的首席代表会谈。熊将军为此一夜未眠，拉着我和众将领及幕僚们坐在他的房间里焦急不安地等候着会谈的结果。看着他那一副坐卧不安的样子，我想起杜聿明将军给他下的评语：“此公多谋而寡断，”不禁哑然失笑。

当时，三人小组中除了国共双方代表外，还有美方代表。美国人表面上是以仲裁者和调停者的身份发挥作用，实际上对国民党方面则多有偏袒，我们的代表和中共的代表争论时，常常得到美方代表的支持。甚至后来有一次美方代表在四平街前线视察时竟对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用飞机配合作战？如果用飞机轰炸的话，四平街是很容易攻下的。”熊式辉将军对美国人的真实意图是非常清楚的，故他曾一再对我说过：“盟方（指美国）的代表是支持我们的，只要我们运用得法，就可以使三人小组的活动对我们有利。”以后他也确曾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三人小组在东北活动期间，我同中共方面的代表也曾有些接触。那时双方虽然处于敌对状态，经常在会上为各自一方的利益互相大动肝火，甚至有时几乎搞到剑拔弩张

的地步。但在私下接触时，却还都是心平气和、彬彬有礼的。共产党人表现出的那种坚定沉着、通情达理、胸襟开阔的气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记得在1947年初的某一天，国民党长春市政府（那时长春已在国民党军队占领之下）举办舞会招待停驻该市的三人小组。彼时我恰巧亦在长春，故也应邀参加了。几曲舞毕，我走到舞池边坐下休息。稍顷，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李敏然也走了过来，我们便随意攀谈起来。也许都是湖南同乡的缘故，俩人聊得很投机。在谈到各自以往的经历时，李氏笑着告诉我，他年少时，因不满社会黑暗，曾投到湖南督军赵恒惕的营盘中当兵。一次偶然与赵下棋，将赵“杀”得大败亏输。赵因见他不仅棋艺超群，而且才华过人、志向不凡，故对其格外器重，以后还资助他去北京进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不久即赴法留学，开始了革命生涯。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立三。我在惊奇之余，忽然想到在黄埔军校时的好朋友贺声洋，是因追随李立三而犯严重错误的。不禁冒昧地向他询问起有关“立三路线”的问题。话一出口，我又后悔了，心想自己好糊涂，我同他非但没有朋友交情，而且还是敌对的人，此时提这些事不是令对方难堪吗？岂知李氏并未露出难为情的样子，反倒非常歉然地摇摇头说：“咳，以前真是乱搞哟！”接着又很认真地讲了一些自我批评的话。同李立三同志的这一番谈话，使我极受感劝。尽管那时我心中对共产党还怀有很深的成见，但对共产党人这种襟怀坦白、大公无私，对任何人都不避讳自己的错误和过失的宏大气度，却不能不怀有深深

的钦敬之意。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三 进攻本溪及首战四平街

我们进占沈阳不久，蒋介石先生给熊式辉将军和我下了一道密令，限我们于4月2日以前占领四平街。为此，我们连夜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略。

会上，大多数将领认为位于沈阳东南的本溪是解放军的重要据点，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又集结有十万重兵，对沈阳是个严重威胁，必须首先拔除。但蒋先生限定4月2日前攻占四平街的命令又不能违背，所以会议最后还是决定：由刚到东北的另一位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长官梁华盛将军到中长路方面，指挥新1军和第71军先行向四平街方向发动进攻；稍后另以第52军军长赵公武将军指挥该军25师由抚顺出发，新6军之14师由辽阳出发，分两个纵队于4月7日向本溪进攻。

在北线，新1军自3月18日开始沿中长路两侧向北进攻。第71军则在左翼与新1军平行推进，向法库、康平进攻。但两军均以解放军的有力抵抗，进展极为迟缓。双方激战至3月27日，新1军才攻占开原，4月4日进占昌图。同时，71军亦占领法库。

不料，解放军于4月8日集中四、五个旅的兵力，突然在昌图以北地区发动了一次十分凌厉的反击，首先将左

翼71军87师击溃，该师副师长、参谋长均被生俘。解放军趁势扩大战果，接着便向正朝四平街方向挺进的新1军新38师发动猛袭。新38师猝不及防，顷刻间就被吃掉三个连，有一部分解放军一直突入到该师师部门外，一边卧到院墙上向内打枪，一边高呼“缴枪不杀”！新38师师长李鸿是随我出征印缅的老部下，作战经验十分丰富。此刻他表现得很沉着，指挥师部人员拼死抵抗，并命该师特务连等部队发动逆袭，终将解放军击退，稳住了阵脚。

这一仗新1军损失的兵力并不大，但精神上受到的打击却不小，此后再也不敢轻视解放军的力量了。

真是祸不单行，就在北线受挫的同时，南线进攻本溪的国民党军队也吃了败仗。4月7日前后，解放军3纵、4纵先后将新6军14师、52军25师击溃，52军副军长郑明新、25师师长刘世懋和14师一名副师长负伤，两师共损失1800余人，其中25师有一部因厌战放下武器。

败报传来，使我们受到很大震动。部分军队竟在火线集体放下武器，当时在东北尚属首次。特别是连素有王牌军之称的新1军和新6军也挨了打，这一切都令人人为吃惊。那些天，熊式辉将军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再也见不到当初他那一副骄傲自得的样子了。由这个时候起，在东北的高级将领们，包括我在内，才算真正领教了解放军的厉害，从榆锦作战以来的盲目骄傲情绪中清醒了过来。

在熊将军的主持下，我们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对策。鉴于此时已无足够兵力在南北两线重新发动进攻，我们被

迫决定暂时放弃对本溪的进攻，集中力量在北线作战。同时，因坐镇昌图指挥的梁华盛将军在新1军、第71军受挫时表现惊慌，曾一再向沈阳发电求援。熊将军嫌梁氏太沉不住气了，遂与我商议，要我到前方接替他指挥。

这期间，孙渡将军率领的云南部队第60军和第93军正陆续开到东北。这两个军的兵力如何使用，倒使熊将军和我颇费了一番心思。从战略上看，当时这两个军倘集结使用于中长路方面，其作用要大得多，但出于对非嫡系部队的猜疑，我们又不敢这样做。最后决定把这两个军分开，不让他们在东北形成一个集团的势力；并令60军的先头部队182师开到铁岭，担任中长铁路的护路任务。以后60军就使用在中长路方面，93军则使用于锦州、热河一带，这两个军始终是各在一方。类似这种出于内部派系成见，而宁可牺牲战略上利益的现象，在那时的国民党军队中是屡见不鲜的。

我于4月10日赶到开原前进指挥所，替下梁华盛将军。这时，中长路正面的解放军主力突然去向不明，我反复推敲，判断解放军很可能将主力转移到右翼，打击我左翼比较薄弱的第71军。于是，我命令新1军继续向四平街推进，同时反复叮嘱正由法库向八面城前进的第71军（欠88师）务必小心谨慎，提防解放军主力的袭击。为了指挥便利，我亦把指挥所由开原移至昌图。

我到昌图后，亲自赶到最前线督促、指挥新1军各部发动攻击。经过观察，我发现该部在作战指挥方面不够大胆，有些畏首畏尾。同时陆空、步炮火力亦不协调，未能

将我军的火力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故在各兵种协同作战方面重新作了调整，并严格督导各师积极进攻。此后两日战斗进展较为顺利，我再将指挥所推进至红庙车站。

岂知4月17日这一天，我突然接到左翼第71军的报告：该军于15日在金家屯以北，大洼以南地区果然遭到解放军袭击，激战两日，通讯联络亦被迫中断。87师有一个团被歼，两个团被击溃，师长黄炎仅以身免。前往增援的91师一部也被击溃。

第71军的这次惨败使我非常恼火，但除了责怪该军各将领疏忽大意外，仍抓紧重新调整兵力，尽量加以补救，不敢稍有松懈。事后查明，在87师北进至大洼附近时，解放军已集中大约14个团的兵力预先设下重重埋伏。87师先头团到达后，当地群众哄骗他们，说解放军早就开走了。官兵们信以为真，纷纷到附近集市上闲逛。解放军乘其松懈，在集市内的解放军便衣队配合下，突然发起围攻。该团措手不及，旋被解放军内应外合全部缴了械。后面的部队也被解放军截成几段，仓促应战，最后支持不住，全师连同增援的91师一部一起向后溃逃。解放军在大洼获胜后，当晚即主动撤退，第71军一部于次日始进入大洼。

第71军在大洼惨败之时，该军军长陈明仁将军尚在沈阳，不在军中。不知是谁将此事报告了蒋介石先生。蒋氏大怒，给长官部发电要查办陈将军。我为此颇不安，因陈氏与我同为黄埔军校一期同学，平日交谊甚好，且其作战骁勇，素有战功，不忍见其因小过而受累。正为难间，恰逢杜聿明将军动过手术，于4月16日匆匆赶回了沈阳。他

亦有意为陈氏开脱，乃一面给蒋先生复电说“在战斗发生前，已派专车送陈回部”，一面要我速告陈氏回部。

陈将军返部后，重新将士气低落、内部混乱的第71军加以整饬，继续向八面城攻击，4月25日始攻入八面城，从而与正面向四平街攻击的新1军互相呼应，完成了对四平街的侧击之势。

四平街是当时国民党辽北省省会所在地，位于中长、四洮、四梅铁路的交点，为东北交通枢纽，工业及军事的重镇。其东北郊山峦重迭，西南郊河流纵横，形势险要，历来为战略上必争之地。已接连控制了北满的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大城市的解放军，力图在北满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乃不惜集结了约14个师（旅）的兵力保卫四平街。据情报判断，解放军驻守四平街市区的部队约有一旅之众（以后兵力又得到大大加强），并以该市为中心，先后组成一条东西蜿蜒百余里的防线，摆好了决战的阵式。

当时我在中长路前线指挥的军队共有新1军和第71军两个军，外加新增援上来的52军195师，兵力与解放军大致差不多。

我反复考虑，认为欲击破北满解放军，占领长春、永吉，四平街势在必争。解放军虽在昌图以北地区对我军发动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袭击，但并未给我军主力造成致命损伤，依现有兵力尚可一战。况且解放军不惜采用打阵地战的方式死守四平街，正好可发挥我军装备精良、火力强盛的优势。因此我下决心按原作战计划强攻四平街。

我的攻击部署是：新1军继续沿中长路向四平街正面

进攻，占领后，其主力进出于四平街以北地区；第71军（欠88师）攻击八面城至旧四平之线，并进出于该线以北地区；195师为总预备队，在新1军与第71军之间地区前进，随时准备策应两军的作战。我的指挥所设于昌图以北的双庙子。

关于195师的使用问题，我曾打算将该师使用在中长路以东地区对四平街作迂回包围，这在战略上讲是比较有利的。但是考虑到第71军有一个师遭受过重创，士气不振，倘解放军以主力对该军反击，可能会吃大亏。同时也担心195师远离主力在群山中前进，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所以最后我决定按照上述的部署行动。

对四平街的攻击开始后，新1军在空军和炮兵的掩护下向解放军阵地发动了持续猛攻，战况十分激烈。解放军方面虽然伤亡很大，但防守极为顽强，简直是寸土必争。新1军第一线攻击部队50师有两个连曾一度突入市区，因前线指挥官未能及时策应，结果全部被歼灭掉，此后50师的几次攻击一再受挫，伤亡惨重。数日后，我不得不将疲惫不堪的50师撤下来，改以新30师为主攻，另以新38师从旧四方面侧击。但新30师师长唐守治顾虑重重，行动迟缓，攻击毫无进展。

这时，第71军已占领了旧四平，新38师亦进至四平街西北附近，对四平街形成夹攻之势。我认为这是取得胜利的绝好机会，乃亲到前线督战，严命新30师在50师协助下再度发动攻击。无奈该军官兵自从在昌图以北遭解放军反击之后，多半胆寒，士气低落，加以新30师师长唐守

治怯敌如虎，始终不敢全力投入进攻，结果在解放军猛烈抵抗下徒遭伤亡，攻击还是没有进展。以后解放军将防守四平街的兵力增至一个纵队左右，并加强了防御之事，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面对战场上的僵局，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作为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的新1军，当时可谓是“国军”中装备最为精良的部队。在抗战期间的印缅战场中，该军与新6军一样，素以能打硬仗著称，今日却在装备低劣的解放军面前一再受挫，屡攻不克，真使我又气、又急、又不服气。

为了恢复战场上的主动权，我曾打算请求增加兵力，由四平街东北地区，采取迂回包围的攻击战术，再次发动猛攻，但因抽不出部队，只好暂时作罢。

这期间，在沈阳的杜聿明将军经常同我通电话磋商。他认为本溪与沈阳唇齿相依，为沈阳门户，解放军主力集结在本溪附近，对沈阳威胁极大，而北满方面我军屡受挫于坚城之下，师劳无功，非增加兵力则无法打开僵局。因此莫若调整、增加一些兵力，先打下本溪，将本溪解放军压迫至连山关以南，这样既可保障沈阳安全，又可抽调一个军以上的兵力增调至四平街方面作战。我反复分析东北战场的形势，也认为杜将军的设想是可行的，遂表示同意。不久，他亲自来到我设在双庙子附近的前进指挥所视察，并部署前线部队暂时停止对四平街的进攻，加紧整顿。

自北平别后，杜聿明将军与我还是第一次见面，虽然时间相隔不到三个月，彼此却仿佛有分别三秋之感。那时

他虽已动过手术，但身体尚未康复，仍很虚弱，我一再好意地劝他保重身体，暂时先不必亲到前线奔波。他苦笑道：“当初是我在委员长身边力主收复东北，今日仗若打不好，我是无法向老头子（指蒋先生）交代的。”稍顷，他又振作起精神说：“现在我们调整一下兵力，先打下本溪，以后还是有把握拿下四平街的。”我很钦佩杜氏在困难面前的坚定态度，但心里清楚：今后若指望在短期内一举抢占东北是绝对不可能的了，将来的局势会变得更加艰难复杂，胜负难料。这些忧虑，我只是埋在心里，未敢讲出来。

4月29日清晨，国民党军队开始在南满向本溪的解放军发动进攻。在辽阳的新6军主力和在沈阳苏家屯以东及抚顺地区的第52军主力同时夹攻本溪解放军。东北行营和长官部事前对这次军事行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对外宣称杜聿明将军赴四平街前线督战，借以迷惑解放军。

进攻本溪的军事行动较为顺利，经几日激战后，第52军于5月3日首先进入本溪，当晚解放军主力即主动南撤。次日，第52军占领宫原，并同在本溪桥头的解放军掩护部队发生激战。该军一部在空军和炮兵火力支援下，经近一日的剧烈战斗，在付出相当大的牺牲后，终于攻占桥头，进占连山关及其以东、以西一带阵地。至此，本溪方面的战斗暂告一段落。

就在我军进攻本溪的战役即将结束之际，解放军有两个纵队左右的兵力由西丰方面南下，有切断我军中长路后方联络线的模样，开原和铁岭先后告急。杜聿明将军闻报急调195师及88师星夜开往铁岭、开原附近，掩护中长路

的安全；稍后又将新6军及207师火速转运至中长路方面，在开原附近集中。在完成上述部署后，国民党军队于5月中旬开始对四平街解放军实施两翼包围迂回攻击。从此时起，中长路方面的作战由杜聿明将军亲自指挥，我仅以前敌指挥的身份在前线督战。

当时北满方面国共双方的军事态势是：据守四平街一线的解放军主力共约三个纵队，在老爷岭、四平街、旧四平及昌图以东之赵家沟、住家屯一带占领阵地，顽强抵抗，与新1军及第71军（欠88师）处于对峙中；沿西丰南下的解放军两个纵队，以切断中长路为目的，与驻铁岭，开原的第60军182师、第71军88师及第52军195师发生局部接触；新6军于开原附近集结完毕后，国民党军队以击破四平街解放军主力，一举收复长春、永吉为目的，分三个集团向四平街包围进攻。具体部署是：左翼兵团第71军两个师向四平街以西进攻，造成解放军侧翼顾虑。中央兵团新1军三个师继续在四平街正面实施攻击。右翼兵团新6军等五个师向四平街以东实施迂回。此路是国民党军队的攻击重点。

5月14日，三路国民党军队在空军和炮兵强大火力支援下大举向解放军进攻。当晚，右翼兵团在威远堡门附近遭到解放军猛攻，双方混战一夜，拂晓前解放军即主动撤退。此后连续激战数日，除中央兵团之新1军遭解放军顽强阻击，毫无进展外，左右两翼均较顺利。右翼兵团之新6军于17日进占西卡，随后进出平岗。5月18日，右翼兵团突破解放军在四平街外围的重要防线，对坚守四平街东

南塔子山的解放军某部实施三面围攻，经激烈的拉锯式争夺，解放军因伤亡殆尽被迫放弃阵地。18日晚，向哈福屯进攻的195师与解放军发生激战，随即占领哈福屯，并进出老爷岭。

由于右翼兵团的迂回作战取得成功，直接包抄了坚守四平街的解放军主力退路，使解放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当夜，解放军即实行战略撤退，主动放弃了已坚守一个多月的重镇四平街。解放军的这次行动十分迅速，一夜之间就将防守四平街一线的部队四散撤走。19日四平街已成一座空城，新1军始开入市区，首次四平街会战遂告结束。

这次四平街会战虽然以国民党军队的暂时胜利而告终，但我们并未达到消灭北满解放军主力的战略目的，以后随着进占长春、永吉，战线进一步拉长，机动兵力不足的弱点反而更加突出。此外，国民党军队不仅在此次作战中受到比较严重的损失，也暴露出许多弱点，诸如前线指挥不够果断，各部队及各兵种间的作战不能充分协调，官兵士气低落等等。从解放军方面看，此役虽迟滞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为巩固后方赢得了时间，杀伤了相当数量的敌人，但自己一方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斗力消耗很大。解放军在当时装备、兵力均不占优势的条件下，力图固守一城一池，以浅近的防御纵深和宽广的防御正面同国民党军队决战，战略上不能不说是失策的。只是由于实行了果断、迅速的撤退，才避免遭受到更大的损失。

四 进占长春、永吉

在四平街会战激烈进行之际，蒋介石先生非常关注这一战役的成败，5月17日特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将军到沈阳视察。白氏在当晚与杜聿明将军详细分析、研究了北满军事情势后，又于次日在杜将军陪同下亲临我设在开原的前进指挥所视察。大家本是熟人，见面之后也无须什么客套，便在我的住房内就当前的战况和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进行了秘密磋商。白、杜二位将军都认为攻下四平街是不成问题的。但白将军对于我们下一步攻占长春、永吉的作战计划却有些忧心忡忡。他说蒋先生也很担心在长春附近再次遭到解放军顽强阻击，倘在那里如同四平街一样形成旷日持久、师劳兵疲的僵持局面，莫若打下四平街后不再向长春北进，这样一则可以缓和国内外舆论的非难，二则可以获得整训部队的时间，假如与中共和谈失败再发动进攻不迟。杜将军则力争一举攻下长春、永吉。他一再向白将军说明，我军攻击四平街的目的，就是为了击败共军主力，一举收复长春、永吉。况且命令已经下达了，中途变更部署是很困难的，反而容易使部队混乱，有为共军乘机反攻，各个击破的危险。如果我们能一直打到永吉，可以隔松花江与共军对峙，形势较为有利，还可以接收小丰满水电站，

供给长春、沈阳用电，否则东北用电都成问题。白氏一边专注地听着杜将军讲话，一边频频颌首，但看上去还是不大放心。听毕杜的讲话，他又转过身，笑着问我：“郑副长官的意见如何？”我也表示了应当乘胜攻下长春、永吉的意见，并补充说，共军整补、扩充的能力非常强，若此时不乘胜追击前进，不仅将前功尽弃，而且后患无穷。听了杜和我的一番话，白将军似也有所心动，只“哦”了一声，便不再言语了。其实我心里明白，白氏也是有意乘胜占领长春、永吉的，只是感到没有把握，不敢妄动。这时，我们闻报右翼兵团已迂回到赫尔苏附近，并未遇到解放军的有力抵抗，正在继续向公主岭前进中。这个消息使白将军非常高兴，他也预感到解放军可能不会固守长春，遂又拉着杜将军一同到红庙前方视察。据说在火车上二人继续研究进攻长春、永吉问题。白将军一再询问杜有无把握，杜氏则表示有绝对把握占领长春、永吉。最后白氏总算放下心来，对杜说：“如果确有把握的话，我也同意一举收复长春、永吉。那么你就照原计划打，我马上回去同委员长讲，收复长春、永吉后再与共产党谈判下停战令。”

白、杜二将军当日即同返沈阳。次日，白氏便飞回南京。

白崇禧将军离开沈阳不久，杜将军曾接到蒋先生的电令，嘱其攻占四平街后，暂不进入长春。杜研究来电日期，是在白将军飞返南京以前发出的，便未依令行事，而是按原定作战计划，与我一起指挥各部沿中长路两侧齐头并进，向长春、永吉进攻。后来的情况果如我们的所料，解放军

并无与我军再次决战的企图，只是派出一些小部队节节阻击，步步后撤。在追击战中，我方右翼兵团于5月21日占领公主岭，22日占领长春，24日占领东丰、海龙，28日占领永吉，31日占领小丰满、桦甸等地；左翼兵团于5月下旬占领了辽源、双山，5月30日进至松花江南岸；惟中央兵团之新1军因军长孙立人将军托辞伤亡过大，亟需休整，未按作战命令沿中长路以西（不含中长路）经怀德、长春、德惠、农安方面向松花江北岸要点追击，部队前进至公主岭以西地区即逡巡不前。

孙立人将军是一位治军严整、才华横溢的优秀将领，在抗日战争中以卓越战功闻名中外。新1军开入东北不久，他应英皇之邀，前往伦敦受勋，以后又去美国游历了一番。蒋先生对此事曾大为不快，但考虑到同美国人的关系，一时对他也无可奈何。在四平街会战后期，孙氏方回到部队，很想借攻占东北名城长春使新1军扬威东北，却未想到杜将军把攻击长春的任务划归了新6军，因而心中十分不满。孙将军一向认为新6军廖耀湘部，是杜聿明将军的基本部队，怀疑杜有偏心。这次事情未能如愿，便不大高兴，不愿积极执行杜将军的命令。

当时我正在泉头指挥所指挥作战。听到新1军仅派50师向公主岭、长春方向推进，主力尚未出发的报告，十分焦急，即与新1军联系，要该军主力迅速出击。但孙将军在电话中吞吞吐吐地强调部队耗损太大，需要整补，就是不愿服从追击作战的命令。我与孙氏于抗战期间在印缅战场虽曾一起共事几年，彼此相处甚好，但亦知此时他与杜

将军矛盾较深，一时很难说服他。正踌躇间，杜聿明将军忽然于20日清晨乘专车来到泉头指挥所，我便委婉地将此事告诉了他。杜闻言大怒，连连问我孙军长为什么不肯服从命令。我担心杜将军性情急躁，倘与孙将军一下子闹翻，后果更难收拾，所以有意不提孙氏对杜的不满，只是建议一起找孙将军谈谈再说。杜将军略想了想，也只好同意了。

于是，杜将军与我马上乘车赶往四平街，到达双庙子车站后，得知通往四平街的桥梁尚未修好，即在该站停留指挥。此刻，杜将军心急如焚，显得十分焦躁，一边皱着眉头，怒气冲冲地在室内来回踱步，一边焦急地对我说：“现在左右两翼都在追击作战中，只是孙军长的中央兵团不能配合行动，倘被解放军看出破绽，集中主力向新6军反攻，我们会吃大亏的。”我心里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点，却又怕给杜增加烦恼，所以只说了些宽慰他的话，同时劝杜见到孙氏时，最好以大局为重，对孙多加劝导，尽量不发脾气，切勿将两人关系彻底搞坏。正说话间，孙立人将军赶来见我们。他仍以部队作战过久，必须整补为由，当面向杜提出宽限追击期限。杜将军压住火气，向他详细分析了北满战场情势及我们的处置决心，希望他能遵令率部向长春追击前进，并提醒孙说，50师孤军深入，倘在长春附近遇敌反扑，必遭覆没，应当迅速前往接应。我亦从旁多方规劝。无奈孙氏坚持不肯前进。这时时间已到正午，杜将军见反复劝导均无结果，不禁勃然变色，站起身厉声对孙说：“现在廖耀湘、陈明仁两部进展极为顺利，并未遇到敌人有力抵抗。新1军应迅速照令前进，否则长春攻不下，部

队遭受损失，你是要负责任的！”孙氏见势成僵局，才快快回部，但始终未按杜的命令行事，只是担心北进的50师受梨树方面解放军的袭击，曾派遣一部前往扫荡。当晚，我们接到新1军的报告，说“梨树之敌经派队扫荡后，已向辽河北岸撤退，正面50师到达辽河南岸附近”。素以办事强硬果断著称的杜将军，此时也只有长叹一声，别无他计了。

幸亏后来情势的发展并未出现我们担忧的情况，解放军主力无意恋战，便纷纷撤到松花江以北。杜聿明将军和我紧提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国民党军队在北满一时的得手，使蒋介石先生大为高兴，他放弃了原来不再北进长春的打算，大约在5月23日左右偕白崇禧将军亲自飞到沈阳，指挥军队向解放军进攻。

但就在这时，南满解放军为牵制国民党军队北上，集中了约三个师兵力，发起“鞍海战役”，向鞍山、海城、大石桥一带进攻。当时驻守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等地的，只有第60军184师，兵力十分单薄。25日，解放军攻克鞍山，全歼184师一个团，随后乘胜南下海城，驻守海城的该师师长潘朔端纷电告急。

这下南满的战局骤然吃紧。鞍山一失，沈阳门户洞开，而沈阳城中又没有什么正规部队，倘解放军前来攻城，连蒋介石先生和在沈的将领们都很危险了。为了解救危局，杜聿明将军连夜集中了数十列火车，限令新1军（欠50师）于26日以前集中辽阳，迅速解海城之围，并收复鞍山。鉴于上次教训，杜聿明将军预料到孙立人将军可能不会痛痛

快地执行救援任务，便径去见蒋先生，向他汇报了军事部署情况，请蒋先生督促孙氏遵照命令去解海城之围。蒋先生郑重地表示同意。但到了次日，蒋先生突然又召见杜将军，说已允诺孙部休息三天，要杜命 184 师死守待援。杜将军心中叫苦不迭，但亦无法变更他的意见，只好垂头丧气地退下来，一面令驻本溪的第 52 军抽调一师部队前往增援，一面静待 27 日运新 1 军去解围。

新 1 军先头部队于 28 日抵达辽阳，这时海城守军正危在旦夕，部分阵地已被解放军突破，潘朔端竭力抵抗，据说还处决了几个作战不力的军官。援军却行动迟缓，在辽阳观望不前。29 日，新 1 军全军（欠 50 师）集中后，始派一个师南进到鞍山，但为时已晚，潘将军终于被迫率师直和一个团残部在海城宣布起义。解放军随后主动撤出海城。在国民党军队大张“捷报”，鼓吹收复海城时，解放军继续南下，相继攻占大石桥、营口，再歼 184 师另一个团。

184 师的覆没，特别是潘朔端将军的临阵起义，震撼了整个国民党军队。熊式辉、杜聿明等一些在东北的将领借此指责孙立人将军，惟蒋介石先生缄口不言此事。

南满的战局稍稍缓和后，蒋介石先生于 6 月 3 日亲赴长春作短暂视察。当时，我的指挥所已移驻长春，闻讯即率在长春的众将领、幕僚和团以上军官及地方士绅前往机场迎接。蒋的专机刚一在机场停机坪上停稳，他便满面春风地走下舷梯，高兴地向我和廖耀湘等几位高级将领打招呼。随后，蒋先生在我们陪同下来到飞机场大厅，先后接见了等候在那里的众多中级军官和长春士绅、商人，讲了

一些慰勉之类的话。

众人散去后，蒋介石先生单独留下我和廖耀湘等几位高级将领，在机场休息室密谈。他先简单地了解了一下北满的军事情势和敌我双方的部署情况，然后很郑重地对我们说：“政府经与中共方面谈判，决定在东北战场实施短期停战，倘无情况变化，停战令可能在近日内下达，你们务必做好充分准备。”接着他再三强调，要我们在停战期间抓紧整补军队，调整部署，特别要提高警惕，严防中共“破坏”停战，等等。

关于在东北短期停战的安排，我先已知道。但谁心里都清楚，所谓“停战”，不过是企图赢得一个喘息时间而已，以便为下一步的军事进攻做好准备。在国民党军队占领整个东北之前，这个地区的和平是不会出现的。此刻蒋先生大讲加紧整补部队，严防中共“阴谋”等，无非是让我们在军事上做好准备，一旦在谈判桌上不能压迫中共就范，就再次诉诸武力。

蒋先生讲过话后，便逐一询问大家还有什么话要讲，众人均表示服从“政府”决定，一定要按委员长的训示去做，蒋闻言高兴地笑了。临行前他还特别对我和廖耀湘将军指示说：“拉法这个地方很重要，须派兵防守。”见我们唯唯称是，才放心地与众人告别，登机匆匆离去。

拉法是永吉以东的一个铁路、公路交叉点，控制这一点可切断延吉至哈尔滨的铁路交通，战略意义的确很重要。但以前我们考虑此地与后方交通联络补给不便，且地形低洼，无险可守，很容易被解放军吃掉，故未曾派兵占领。这

次蒋先生亲自提出要占领拉法，我们不好违逆，随后便由第71军88师派出一个加强团占领了该地。岂知三天之后，解放军果然集中优势兵力对拉法发起突然反击。待88师派援军赶至时，守军已遭全歼，团长阵亡。以后这个战略要点还是被迫放弃了。

蒋介石先生飞离长春三日后，即6月6日，东北战场的停战令终于下达了，并于7日起生效，为期半个月。此后，由于关内内战烽烟大起，东北国民党军队一时无法得到新的增援，故停战期限一再延长，直至10月中旬，东北战场基本上维持了四个多月的停战状态。

五 进 攻 热 河

1946年8月初旬，杜聿明将军突然发来急电，要我迅速由长春返回沈阳。我不知何事，即匆匆飞返沈阳，下了飞机后，便由机场驱车径奔长官部大楼。一见面，杜将军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保安司令长官部要在锦州设立指挥所，拟由你负责，任务是指挥扫荡热河境内的共军，以保持北宁路的安全，并相机攻占承德，确保东北、华北的联系。军情紧急，希望你赶快赴任。”

我因一直驻防长春，事先对此项军事行动计划并不了解，有些担心停战期间在热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容易引起社会舆论的非议，于我不利。杜将军看出了我的心思，狡黠地笑笑说：“桂庭兄不必多虑，停战仅限于东北地区，热河本不属调处范围，共产党奈何不了我们。况且共军李运昌部约五万人正在那一带积极活动，对我北宁路威胁极大，若不迅速予以消灭，我们就难免有后顾之忧啊！”

我见杜将军计议已定，便不再说什么，接受了任务，数日后即动身前往锦州。

我到锦州指挥所后，杜将军已亲自拟定了作战部署，我便开始着手执行。当时参加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有第13军石觉部、第93军卢浚泉部和第71军91师，以及一些地方保

安部队。我认为这些部队战力虽不甚强，尤其缺乏同解放打硬仗的经验，但装备大多比较好，人数亦占有优势，只要指挥得当，是不难取胜的，因此较有信心。

我方作战计划的要点是，先以一部兵力扫荡平泉以东、锦州古北口铁路以北地区的解放军，继以主力一举攻略承德，相机占领赤峰、围场、丰宁等各重要据点，进而控制热河全省。

根据这个作战计划，国民党军队作了如下部署：第13军及保安骑兵支队先肃清天义、宁城以南、锦古路以北地区的小股解放军，然后集结于平泉附近，一举攻略承德，并进出隆化、围场附近；第93军（欠暂编20师）先肃清凌源、绥中公路以东地区的小股解放军，再集结于朝阳附近，接替朝阳地区第13军的防务，并向赤峰方面警戒，掩护第13军之侧背。俟该军攻占承德后，相机向建平、赤峰进出。

鉴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地区作战的教训，我特别注意强调了相对集中地使用兵力的重要性，并加强了各部队间的通讯联络工作，使其在作战中互相呼应，以免为解放军各个击破。这些原则在后来的作战中均得到了较好的贯彻。

8月中旬，我正式下达了进攻命令。第93军首先兵分两路，其右纵队暂22师于15日由义县、北票，分别向伊马图、大乌兰、黑城子、西官营子等地扫荡，沿途仅遇到小股解放军的零星抵抗，乃于24日顺利地进抵朝阳集结；其左纵队暂18师也同时由锦西、兴城向药王庙、六家子、羊山等地扫荡，于23日到达叶柏寿集结。

在第93军发动攻击后不久，第13军亦于21日出动

54 师、89 师，分别由黄土梁子、天义向宁城方向扫荡前进，解放军稍事抵抗即退去，该部于 24 日占领宁城，交由地方武装接防后，即开赴平泉集结。至此，第一期作战任务即告完成。

进攻热河的初期扫荡战如此顺利，使我和第 13 军、第 93 军的将领们确实有点出乎意外。我担心解放军采取惯用的诱敌深入战术，趁我军战线拉长，兵力分散，集中兵力突然攻击我方某一薄弱点，进而瓦解我军进攻，乃向各部一再重申，要集中使用兵力，注意作战配合，加强谍报工作等等，并严令各部凡遇邻近友军遭解放军攻击包围，均应迅速驰援，倘有逡巡观望、救援不力者当以军法论处。

下达了上述命令后，我开始着手执行下一步作战计划。这时，第 13 军已于平泉附近集结完毕，该军军长石觉将军向我报告说，有确切情报表明承德的解放军大部队正向北撤，要求适机发动攻击。我判断解放军不会在承德附近与我展开主力决战，遂令该军立即进攻承德。

8 月 26 日，第 13 军由平泉附近分两路向承德发动进攻。右路军 54 师及 89 师一个团由黄土梁子攻击前进，28 日攻占大庙，29 日迂回至承德北部，造成承德守军的侧翼威胁；第 13 军主力由平泉攻击前进，27 日占领六沟，28 日在承德附近与解放军杨、苏纵队发生激战（杨苏纵队即晋察冀野战军第 1 纵队，司令员为杨得志，政治委员为苏振华）。29 日，解放军在第 13 军两路夹攻下撤出战斗，该部占领承德，并于次日进占滦平、隆化，9 月 11 日又占领丰宁。

第93军于8月29日以第13军方面已占领承德，进展顺利，亦分两路向建平、宁城攻击。右纵队暂22师由朝阳北进，9月4日占领建平，随后该师迅速派出一团兵力向建平西南方向扫荡，但当天中午就在华子里沟附近遭到解放军七千余人的突然围攻。该团一面连连告急求援，一面拼命抵抗，与解放军激战彻夜。5日晨，第93军暂18师主力闻讯赶至，立即对解放军实施反包围，血战至晚，解放军不支撤退，该部之围始解。这是国民党军队进攻热河以来，所遭到的最激烈的一战。被包围的一团官兵在战斗中虽然损失了三分之一，但由于该部能坚持抵抗，且由于暂18师救援及时，总算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我闻讯大为高兴，立即嘉奖了这两部官兵，事后还专门向长官部为其请功。

第93军左纵队暂18师9月3日由天义向宁城攻击，5日转向华子里沟方面解暂22师之围，11日重占宁城，解放军即主动向赤峰方面撤退。

第93军占领建平、宁城后，长官部为彻底扫荡热北解放军，遂将警备北宁路的暂20师北调，归还该军建制，并配属第71军91师，由孙渡将军指挥，于10月4日向赤峰攻击，沿途未经激烈战斗，当日便占领赤峰。

与此同时，相继占领承德、隆化、丰宁等地的第13军，一面就地积极构筑防御工事，一面努力试图扩大承德外围的占领地区。该军于10月4日派出一部兵力分两路由隆化、丰宁，向围场攻击，5日进至张三营、郭家屯之线，未经战斗，于7日占领围场。12、13日再分兵进占多伦、沽源。同时为策应张家口作战，该军还派出两个师占领赤城。

国民党军队进攻热河的战役遂告结束。

在攻击热河的作战中，由于解放军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不事强攻死守，兵力集散灵活，避强击弱，故双方未曾发生主力决战。国民党军队虽占领了许多城镇，暂时维持了北宁路方面的安全，却因为处处分兵把守，后来反而陷于被动局面。

六 进攻南满，四战临江

热河方面战事结束后，我即回到沈阳向熊式辉主任和杜聿明将军复命。他们二人对于能这样顺利地解除掉解放军对北宁路的威胁，感到十分满意，但谈起东北地区今后局势的发展，却还是忧心忡忡的。

自这年的六月上旬到十月，东北战场上虽然出现了长达四个多月的休战状态，然而整个局势和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已经开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解放区，中共方面抓住停战时机，积极创建、巩固根据地。停战令刚一下达生效，中共便派出大批干部和部队深入农村，一方面迅速地肃清匪患，建立基层政权；一方面发动农民，大力进行土地改革，赢得了农民群众的广泛拥护，使解放区很快就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在军事上，中共也抓紧时机进行了整顿，将其主力部队整编为五个纵队，十五个师，十个独立师，四十四四个独立团，并初步建立了炮兵、装甲兵、工兵等兵种，总兵力达23万人左右，同时还组建了大批第二线兵团。

而在国民党统治区，情况却是每况愈下。早在进攻东北之初，许多国民党官员就是抱着抢肥缺、发横财的目的来到这里的。随着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占领区域的扩大，吸

引了更多的人涌入东北。这些大大小小的国民党官员，置东北人民的生死于不顾，采取贪污、受贿、营私、敲诈等种种手段，拼命吮吸人民的血汗。一些地方豪绅也在国民党政府的纵容下，欺压百姓，雄霸一方。至于官场上，则更是乌烟瘴气。各派系之间角逐激烈，纷纷任用私人，排除异己，上下沆瀣一气，纲纪荡然。更糟的是，军队中的腐败现象也更加严重了，许多高级将领和中级军官竞相用贪污和克扣军饷赚来的钱，购置房产土地，经营私人企业，甚至还有人从事走私军火、倒卖黄金等勾当。军队的纪律日益废弛，一些部队，特别是地方武装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连号称“王牌军”之一的新6军，在驻防长春期间也时有违纪事件发生，杜聿明将军为平息舆论非议，不得不将该部与驻扎于鞍山、海城的新一军相互对调，才算暂时了事，所有这些使东北民众大失所望，原来对国民党政府和“中央军”所抱的幻想随之破灭了。当时在东北国民党占领区流传着一句话：“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人民对国民党政权的强烈不满，由此可见一斑。现在回顾起来，应该说，从那个时候起，国民党政权在东北就已开始走下坡路了，它在东北的最后失败，不是偶然的。

当时，对于东北社会秩序紊乱，人民怨声载道的局面，熊式辉、杜聿明和包括我在内一些高级将领，虽然忧虑重重，却毫无办法。我由锦州回到沈阳不久，又奉命派驻抚顺营盘指挥所。临行前杜聿明将军曾于某日晚上在其住处设宴款待我。宴毕，我们二人相对晤谈至深夜。谈话中，我

坦率地提醒他，目前东北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现象，远比当初我在北平见他时预想的严重得多，倘不及时设法，终要失尽民心的。杜将军闻言沉默了半晌，突然睁大眼睛愤愤地说：“人家共产党自有一套主张，懂得发动民众，争取民心，我们懂得什么？还不是大家都想着发财！”停了一下，他又神色凄凉地说：“你说我们在东北腐败，其实全国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下去，我们的天下不会有几天了。”当时，我以为杜说的不过是酒后气话，殊未料到，后来历史的发展果然应验了他的预言：仅仅在短短的两年之后，东北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便遭受到彻底覆没的命运，我本人也被迫在长春向解放军放下了武器。又过了一年，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也终于上崩瓦解了。

然而，那时我们作为蒋介石先生一手培养起来的亲信将领，尽管对国民党在东北、在整个中国的前途已经感到忧虑重重，却没有放弃任何维持这个已失掉民心的政权的努力和企图。我们自知在政治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便将希望寄托于军事上。当时，在东北和热河作战的国民党军队共有新1军、新6军、第52军、第71军、第13军、第93军、第60军等七个军25万人，再加上特种兵和地方武装，总兵力可达40万人。我们幻想着凭借国民党军队的精良装备和人数优势击败共产党军队，进而夺取整个东北地区。

看到共产党军队在解放区不断壮大，其根据地日益巩固，熊式辉主任和杜聿明将军十分不安。经过一个时期的准备和部署，他们决定与共产党军队重新开战。

当时的情形是，国民党政府已废止国共两党签定的停战协议，挑起全国范围的内战。大批国民党军队分别集结在中原、华北、东南等战场上作战，短期内不可能向东北战场增加兵力。而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占领了东北中心战略要地，但要继续同时向北满、南满解放军进攻，兵力则深感不足。为此，熊式辉主任、杜聿明将军经与我们几位高级将领反复研究，制定了一个“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其基本思想是，先集中足够兵力进攻南满，消灭兵力相对弱小的南满解放军，解除后顾之忧，再全力向北满进攻。

根据这个方针，杜将军主持拟定了一个军事方案，其要旨如下：

（一）辽西方面，我军应牢牢控制热河，截断解放军辽西走廊的交通线，确保北宁路的安全；

（二）辽南方面，根据蒋介石先生“旅顺、大连问题，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指示，我军应把解放军压迫于貔子窝、普兰店之线以南，然后用少数兵力在貔子窝、普兰店间的狭仄地带，构筑坚固阵地，封锁旅人与内陆的交通；

（三）辽北、辽东方面，我军应把解放军压迫到长白山及松花江以北，以便沿长白山和松花江布置防线；

（四）完成上述任务后，我军即集中主力进攻北满，以达到占领全东北之目的。

这个军事方案经蒋介石先生和南京国防部批准通过后，杜聿明将军即坐镇沈阳，指挥新6军、第52军、第71军等部队共八个师于10月19日分三路向南满进攻。自此，

沉寂了四个多月的战火，又重新在东北大地上燃烧起来了。

参加这次进攻南满作战的军队多达10万余人，占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强。而南满解放军只有3纵、4纵和两个独立师，人数在5万左右，大大地居于劣势。因此，在我方的进攻下，解放军最初节节后退，被迫放弃了许多地盘。但这种情况却使前线的一些国民党军队将领骄傲起来，以为南满解放军不堪一击，遂不顾相互配合，大胆向前挺进。

10月31日，解放军4纵部队于本溪东南，以迅猛的动作将分路冒进的第52军25师合围于宽甸新开岭地区。该师措手不及，仓促抵抗，经三日激战后，终因孤军无援而遭全歼，师长李正谊以下6500人被俘。这是东北战场国民党军队整师被歼的开始。败报传到沈阳，杜聿明将军大为震怒，连连责骂手下将领无能。早在30年代初，杜曾任该师副师长兼旅长，抗战时该部又是远征军的主力之一，战斗力较强。杜对这支全美械装备的部队一向比较器重，现在居然被解放军轻易消灭，确令杜痛心不已。

25师惨败，并未动摇杜将军坚持既定作战方针的决心。国民党军队经过重新部署后，凭借优势兵力继续向长白山方向压缩，解放军又相继被迫放弃安东（今丹东市）、通化和辑安等城镇。至11月下旬，南满解放军的活动区域仅限于临江、长白、抚松、濛江等县。

12月27日，杜聿明将军集中新6军、第71军等五个师的兵力从通化以南多路向东进攻，企图首先沿通化、辑安铁路构成封锁线，然后进攻临江。但攻势一开始就遭到

南满解放军3纵、4纵一部和两个独立师的正面顽强阻击，进展缓慢。正当双方相持不下之际，解放军4纵主力突然跃到我军后方，直插安东、沈阳铁路两侧，十余日内横扫二百余里，连续攻克我大小据点二十余处，严重威胁着我军后方安全。杜将军未料到解放军会出此一着，急将新6军新22师和第71军91师西调救援。解放军乘此机会向通化、辑安铁路两侧的第52军195师展开反击，双方激战多日，195师终因伤亡过大而被迫退却，国民党军队第一次进攻临江随之失败了。

当国民党军队集结兵力进攻临江的时候，北满的解放军采取“南打北拉”的作战方针，于1947年1月5日，出动1纵、2纵、6纵及三个独立师，沿中长路两侧渡松花江南下，先后歼灭新1军两个团，直接威胁长春、永吉、洮

195 师先后击败，195 师副师长何士雄阵亡。这次进攻又受顿挫。

2 月 21 日，北满解放军乘杜聿明将军南顾不暇，集中 1 纵、2 纵、6 纵及独立师部队共十二个师的兵力，二下江南，以迅猛动作突然包围了九台程子街，进逼九台、农安。驻守程子街的新 1 军新 30 师 89 团猝然应战，很快就被歼灭，九台、农安亦相继失守，解放军乘胜进兵包围德惠。驻守长春和德惠等地的新 1 军接连向沈阳告急。杜将军闻报大惊，一面严令德惠守军拼力死守，一面不得不把进攻临江损失较大的 71 军 91 师调回四平街，同时抽调 71 军主力 87 师、88 师及几个保安支队，号称四个师兵力虚张声势驰援德惠。这时解放军在德惠攻城甚急。防守德惠的新 1 军 50 师某团在副师长王××指挥下，依靠坚固的“城塞堡垒”式防御工事奋力抵抗，使解放军的进攻一再受挫，曾突入城中的一团解放军受到严重损失。当时，大批的国民党增援部队即将赶至，解放军便主动撤围向江北退却。杜将军为鼓舞士气，乘机大力宣传所谓“德惠大捷，歼灭共军十万”。谁知受此欺骗的居然首先是蒋介石先生，他真以为北满解放军早已溃不成军，竟直接命令正在追击前进中的新 1 军和第 71 军渡松花江追击。杜将军当然心中有数，听到蒋先生下达了这个追击令后紧张万分，急忙打电话给新 1 军军长孙立人将军和第 71 军军长陈明仁将军，要他们迅速撤回原防。岂料孙、陈二人却执意不肯，非要渡江追击不可。杜将军又气又急，电话中无法言明真象，只好亲自赶到德惠，当面告诉他们：“此次共军在德惠并未受到多

大损失，这次撤退是受我军虚张声势所迷惑。现据情报，共军从我方被俘人员口中已了解到我们力量不大，很有可能卷土重来，你们必须迅速撤回原防，准备对付共军下一步的进攻。”孙、陈二位将军这才同意撤退。果然，北满解放军于3月8日对一部分冒险尾追解放军过松花江的保安队发起反击，这些部队抵挡不住，仓皇逃回江南，解放军主力遂乘机三下江南，向德惠以南迂回，企图包抄第71军退路。当晚，杜将军带着几卡车卫队由德惠赶回长春布署。途中突然与大批由东向西挺进的解放军遭遇，当即发生激烈交火。解放军并不知晓此刻迎面撞上的就是东北国民党军队最高指挥官的车队，所以仅以一部兵力包围攻击杜的卫队，其余部队继续向前挺进。杜将军亲自指挥卫队与解放军激战良久，最后终于乘小汽车带着部分卫兵冒险冲出，其余卫兵及卡车大多为解放军俘获。

杜将军回到长春后，惊甫未定，即匆匆在市内布防，以备解放军攻城，同时又急调新6军及第13军主力火速开到长春应付危局。当时，新1军已撤进德惠城内，第71军则匆匆退入农安县城，长春城内只有新1军少量留守部队和地方保安部队驻防，力量十分单薄。但解放军只顾以主力包围农安，企图围歼第71军，来不及攻击长春，才使杜将军得以从容调动援兵。

在新6军和第13军主力快要赶到北满以前，北满解放军即将中长路四平长春段、长春德惠段以及长春吉林段等铁路干线严重破坏，然后撤去农安之围，于3月16日主动撤回江北。至此杜聿明将军才长松了一口气。

正当国民党军队主力北上解德惠、农安之围的时候，南满解放军又采取“北打南拉”的战术，乘机向梅河口、海龙、新宾、柳河等重要据点全面进攻，截断通化与沈阳的交通线，并以主力包围驻扎在通化的第52军195师。

杜将军顾此失彼，只好又将新6军和第13军主力转移到南满，准备第四次进次临江，以解通化之围。这时，杜将军经多日过度疲劳，旧病复发，乃命我在抚顺的营盘车站负责作战指挥。

我于3月下旬接受任务后，立即部署兵力，作好攻击准备。3月29日，即下令开始攻击。新6军主力沿营盘至通化的公路向前推进，一路排除解放军的小规模抵抗，于4月初进抵通化附近。通化守军见援兵已到，遂里应外合及时出击，解放军乃主动撤去。但在新6军左侧山区中前进的第13军89师，却于4月3日在通化西北地区被解放军3纵及4纵一部包围歼灭。在此期间，活动于我军后方的解放军4纵部队又将驻守新宾的第52军2师一个团歼灭。鉴于这种情况，我不敢再轻率进攻，乃将部队撤回。这样，国民党军队最后一次进攻临江，仍以失败告终了。

从1946年12月下旬至1947年4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队四次进攻临江，却接连损兵折将，均遭惨败，实力大的削弱，其“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作战方针也宣告破产了。此后，国民党军队再也无力在东北向解放军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而东北解放军则由此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整个东北的军事形势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七 再战四平街

国民党军队四次进攻临江失败后，损失惨重，士气低落，连包括熊式辉、杜聿明在内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有些垂头丧气了，不得不放弃了原来的南攻北守的作战方针。此时，熊、杜二人最担心的是北满解放军再度南下，因为现在再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去应付战局了。他们经过几度磋商，于五月上旬决定派我去南京晋见蒋介石先生，请求向东北战场增派援军。

临行前，杜将军再次将我请到他的住处，躺在病榻上又作了一番交代。他心情格外沉重地对我说：“现在局势非常严重，据情报判断，北满解放军很可能不久又要举行大规模攻势，依我们现有的这点兵力，很难对付。那时不仅北满守不住，连整个东北都有沦落共军之手的危险。”停了一下他又说：“桂庭，你这次去见委员长，一定要陈明利害，无论如何要请委员长再给我们增加两个军的兵力，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至少也要把第53军调回东北战场（第53军原属东北国民党军队战斗序列，临时调归华北第十一战区指挥）。”我也预感到事态的严重，从杜将军那里告辞后，便匆匆飞往南京。

一到南京，我立即前往蒋先生在中央军校的官邸。通

报以后，一位年青的侍从副官将我引至一间墙上挂满巨幅军用地图，显得十分宽敞的房间里坐下，便退了下去。约摸十几分钟后，蒋先生身着便服，推门走了进来，我连忙从沙发上站起身向他鞠躬行礼。蒋先生略点点头说：“哦，你来啦！”便走到对面沙发旁坐下，挥挥手示意我也坐下谈话。蒋先生的面容看上去颇严肃，也有几分憔悴，已不是去年6月初他在长春飞机场召见我们时的那种容光焕发的神情。我正待开口说话，蒋先生先直截了当地问道：“东北的情形怎样？你们有什么打算？”我把前一阶段东北战场上的作战情形和我们面临的危险局面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末了，又按杜将军的意思，提出了向东北增兵的请求。我讲话时，蒋先生口中“嗯”、“嗯”地应着，眉头愈皱愈紧。我把一切要说的都说了，便静静地等待蒋先生的指示。蒋先生沉思了一会，态度很坚决地对我说：“东北的情况确实很严重，你们一定要设法稳定住局面。但目前我派不出军队到东北去，你们要自己想办法。”我一听此言，心里着急起来，连忙再次强调了东北战场的重要性和可能出现的危险局面，蒋先生未等我说完，就打断说：“东北固然重要，南京更为重要。现在各个战场的兵力都不够用，我不但不能给你们增加两个军，就是第53军也不能调回东北。”言毕，他起身踱到地图边，端详了半晌，继续指示说：“你回去告诉熊主任和杜长官，根据目前情况，我军在东北应当采取‘收缩兵力，重点防御，维持现状’的方针，将来再待机出动。现在要增加兵力是绝对没有办法的。”我见蒋先生讲话的态度里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只好向他行礼告退。

了。

次日，我又去国防部见部长白崇禧将军，希望能说动他，请他在蒋先生面前讲一下情，但还是碰了钉子。白将军认为华北比东北更重要，坚持不同意向东北增兵。我们反复争论了许久，仍无结果。我不禁有些气恼，忍不住顶撞了他一句：“东北守不住，华北更守不住。”白氏听了，双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了。我不得要领，只好快快飞返沈阳。

回到沈阳后，我顾不上休息，匆匆去见杜聿明将军。这时，杜将军已病得很重，脸色腊黄，身体瘦弱不堪，我走进他的房间时，他正一边躺在病床上输液，一边同刚从南京到东北就任新6军169师师长的郑庭笈谈话。见我进来，杜将军很高兴，脸上露出期待的神色，急切地问：“桂庭，你回来了？快讲讲情况怎样。”我知道此番去南京的结果必定使杜大为失望，但又不能不如实转达蒋先生的指示。我们谈话时，郑师长亦在侧。早在抗战初期，郑便是杜将军和我的部属，因其治军有方，作战勇敢，故深受我们的信任和器重，对他也没有什么避讳。

听过我叙述完南京之行的全部经过，杜将军的脸色阴沉下来，沉默良久。末了，才长叹一声说：“唉！眼下也只能按委员长的指示精神办了，我们在一起苦撑吧！”

为了贯彻蒋介石先生的指示，杜将军被迫在东北战场上转而采取防御待援的方针，以一部沿松花江布防，一部控制于北宁路和热河，主力则在中心地区机动作战。就在这时，我们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947年5月中旬，东北解放军在晋察冀解放军一部的配合下发起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分别从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和热河、冀东等六个方面向国民党军队进攻，其中南满、北满解放军主力，向长春、四平、吉林之间实施主要突击，意在打破南北分割的局面。

5月15日，北满解放军主力1纵、2纵、及两个独立师渡江南下，于18日攻克长春外围重要据点怀德，然后分兵以一部北进长春，另一部南扑公主岭。不久，长春市郊及机场附近均发生激战，市区已闻枪炮声。长春守军宣布紧急戒严，禁止通行，商店闭门，一时搞得人心惶惶。在怀德遭解放军围攻之际，第71军88师奉命由四平街出援，不料在公主岭以北大黑林子地区突遭解放军包围，全师覆没，师长韩增栋阵亡。此时第71军军长陈明仁将军尚不明情况，正率87师前往增援88师，部队行至公主岭，接到杜将军紧急电话，方知88师已经溃败，乃仓皇撤到辽河以南布防。陈部前脚撤出公主岭，解放军先头部队后脚就跟着冲入该镇，倘再迟延一步，也就无法逃脱了。5月20日，东丰、西丰、西安（今辽源市）等地均告吃紧，驻长春的美国领事馆也匆匆撤退。5月24日至29日，解放军又相继攻克康平、法库、昌图，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四平街。

南满解放军3纵、4纵10师和独立师，也于5月13日对沈阳、吉林铁路中段的山城镇、草市发起攻击，歼灭驻扎草市的一个工兵团。5月15日，新6军军长廖耀湘将军奉命率新22师和207师前往增援，其新22师一部因骄傲轻敌，在南城子地区中伏，导致全师溃退，连一些重炮、装

甲汽车等装备也在突围和退却中丢弃了。而后，南满解放军主力沿梅河口、四平铁路向西进攻，连克东丰、西安等城，与北满解放军主力会师。同时，南满解放军4纵一部也于5月27日围攻梅河口，次日，全歼守军第60军184师（原部起义后，重新又成立者），师长陈开文被俘。

在此期间，活动在冀察热辽交界地区和冀东地区的解放军也分别向锦承路和北宁路出击，积极钳制国民党军队。

这种急转直下的形势震动了沈阳，杜聿明将军一面征集沈阳城内十万居民大修城防工事，一面屡电蒋先生请求调第53军回东北增援，同时星夜从锦州方面抽调第93军两个师防守沈阳。蒋介石先生也感到东北战场的局势危急万分，乃于5月30日亲来沈阳视察。在蒋先生主持的高级军事会议上，我们再次当面向他要求调第53军回东北战场来解救危局，但仍遭拒绝。会议的结果是决定进一步收缩兵力，维持现状。随即国民党军队陆续放弃了安东、通化、赤峰等一些城市。蒋先生本来主张连永吉也一起放弃，因杜将军竭力反对而作罢。这样，此时在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只控制着长春、吉林、四平街、沈阳、锦州等几个大城市及附近的一些小城镇，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

蒋先生在沈阳期间，见到杜聿明将军病情严重，曾要他回关内休养。杜坚决不肯，表示要尽忠“党国”，一定要将局势缓和下来后再去治病。蒋先生当时似乎受到感动，好生抚慰了杜将军一番才飞返南京。

这期间，解放军的攻势仍在继续。6月2日，解放军主力一部（番号记不清了），在炮兵掩护下猛攻开原新、旧城，

与守军第71军54师一部和新6军169师一部发生激战。当夜，守军奉命放弃开原，向铁岭撤退。解放军于次日占领开原。

开原失守，使中长路完全被切断，沈阳与四平街的联系无法畅通。我们估计解放军下一步可能将向四平街发动大规模进攻。因此控制开原这一战略要点更为重要。6月3日下午，熊式辉主任和我在杜聿明将军病床前进行紧急磋商，最后决定抽调新6军新22师和14师，分别从清原方面和辽南方面反攻开原。同时再次命令防守四平街的第71军军长陈明仁将军，加紧整补部队，加固工事，准备大战。6月7日，新6军部队重新占领开原。

未出我们的预料，解放军主力在完成了对四平街的外线包围后，集中1纵、7纵一部、6纵一部、辽热保安1旅、2旅、松江军区的三个独立师和四个炮兵团，共约十余万兵力，于6月14日从南、西、北三面对四平街发动总攻。

四平街攻防战一开始就极为激烈。解放军首先以强大炮火在城西南角轰开一个缺口，继以步兵突入，与守军展开巷战。数日后，四平街铁西地区和第71军军部核心阵地的强固工事均为解放军炮火粉碎，该军88师（被歼后重新整补成立者）和军直属特务团崩溃，连陈明仁将军的胞弟陈明信也被生俘。陈将军被迫率军部退到铁东地区死守，并连连向沈阳和南京告急。

东北解放军对四平街发动的攻坚战，给了蒋介石先生很大震动，不得不同意调第53军到东北增援，同时限令杜聿明将军，必须在6月30日以前解四平街之围。

接到蒋先生的命令后，杜将军躺在病榻上与我及长官部几位高级幕僚连夜研究对策。人家都认为，占领本溪的解放军对沈阳威胁甚大，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在防守沈阳的同时，再去解四平街之围。最后决定以第53军为主力，先扫荡本溪的解放军，以固沈阳门户，然后再集结可以集结的兵力去解四平街之围。关于指挥攻击本溪和驰援四平街的前敌指挥官人选，杜将军一再提议由我来担任。我知道这次作战行动事关重大，困难重重，搞不好就可能遭至全军覆没的下场，那时不仅我自己会在国民党政权中弄得身败名裂，就连国民党在东北的这大半壁江山也保不住了，因此很不情愿担当这种风险。但转念一想，杜将军病情严重，实在无法再亲临前线指挥。而除他之外，也惟有我更熟悉情况一些，各部队也肯服从命令。为了“党国”利益，还是由我承担这项重任比较合适。所以，我仅是表示客气地推让了一下，就接受了指挥任务。

大约在6月17日左右，我亲自指挥第53军周福成部进攻本溪。经过几天艰苦激战，终将该市占领之。我到本溪匆匆布防完毕，即于6月20日前后转到铁岭，布署大军北上解四平街之围。

当时，归我指挥北上解四平街之围的部队计有新6军、第93军、第53军、第52军195师，以及一部分重炮、战车部队。

我一到铁岭，即命令原在铁岭、开原一带布防的新6军部队，做好作战准备，并向铁岭至开原及以北的中长路两侧加强警戒。掩护第93军、第52军195师在昌图集结。为

了隐蔽我军作战意图，我特命第53军暂驻本溪，以迷惑解放军，一俟新6军、第93军等部队打响，即迅速转到中长路方面作战。

在攻击部署上，我考虑到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一贯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使我方多次吃了大亏。现在我率大军驰援四平街，倘解放军打援部队主力埋伏在已为其控制的开原以东地区的李家台、东丰、西丰、西安等地，俟我军通过开原、昌图以北地区后，从铁路以东地区进出开原、铁岭，切断中长路，迫使我军在铁岭、开原以北地区与其决战，那么，不仅会延误了救援四平街的任务，就连我指挥的这十几万援军也有被包围歼灭的危险。为此，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以战力最强的新6军专门对付解放军的打援部队。命令该军在开原以东及威远堡门南北之线占领阵地，掩护主力沿中长路向四平街外围解放军攻击。该军随战斗的进展，亦逐步向四平街以东地区攻击前进。第93军、第53军、第52军195师等部队则由我亲自统帅向四平街北进。这一方面的具体部署是：第93军（附炮兵团及战车营）由昌图沿中长路向四平街攻击前进。第52军195师为预备队，俟第53军到达开原后，该师即在第93军的左翼，向八面城攻击前进。第53军为总预备队，随战斗的进展，准备由左翼迂回到四平街西北地区侧击包围四平街的解放军。同时，我还电请长官部和杜将军，出动空军密切配合我地面部队作战，并注意随时侦察中长路以东的解放军的行动。

这时，据长官部的无线电侦察，中长路以东地区电台

甚多，电波特别频繁，我们由此判断解放军2纵、4纵主力可能活动于中长路以东的山区。但到6月26日，该方面的电波突然终止。杜聿明将军估计解放军主力正在转移中，乃电令我们利用这个时机，迅速开始攻击。

6月26日，第93军部队首先投入正面攻击，部队进至距昌图不远处就与解放军阻击部队展开激战。解放军凭借昌图附近地区的丘陵地带，构筑了层层阻击阵地，顽强抵抗，使第93军进展极为缓慢。

在此前后，解放军果如我事先预料的那样，集结大批主力部队，向我担任战略掩护任务的新6军发起猛烈进攻，企图包抄我军侧后。6月23日下午，解放军一部主力部队在炽烈炮火的支援下，首先向驻守八棵树一带的新6军169师发起攻击。

169师是刚刚由国民党交警总队改编成的一支正规作战部队，尽管官兵军事素质较好，但毕竟是初次在东北战场上遭受解放军如此猛烈的攻击，尤其是缺乏步炮协同作战的经验，结果经过一昼夜激战，第一线防守部队伤亡甚众，八棵树附近高地全部失守。新6军军长廖耀湘将军虑及八棵树之得失，关系到新6军右翼及整个增援大军的后方安全，乃严令169师师长郑庭笈务必迅速收复已失阵地。6月25日下午，169师在飞机和地面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反攻，与解放军在八棵树附近各高地展开惨烈的争夺战。至晚七时，解放军因伤亡过大，被迫退却。此后，解放军又转而进攻貂皮屯、威远堡门、莲花街、平岗等地，与新6军各部队连日进行激战。

6月26日黄昏，担任正面攻击的第93军经一日苦战，终于攻陷昌图县城及昌图车站，但随后在昌图以北地区遭了解放军更加顽强而猛烈的抵抗，双方在泉头一线陷于胶着状态。

此时，四平街守军已危在旦夕。解放军夺取四平街铁西地区以后，即迅速由铁道桥以南地区突入铁东地区，与第71军87师、54师展开激烈争夺战。解放军攻击部队为躲避飞机轰炸，多在夜间发动进攻，双方都拼出全力在铁东逐街逐屋地反复争夺，伤亡均极惨重。最后，守军被压迫至市区一角的几个工厂里，继续顽抗，做困兽之斗。陈明仁将军为维系军心士气，据说甚至曾抬出为自己准备的棺木督战，以示与城共存亡的决心。同时亦不断向沈阳告急，哀请杜聿明将军速发救兵。在沈阳的杜将军急得如坐针毡，一面派出大批飞机轮流飞往四平街上空，几乎昼夜轰炸解放军阵地，支援地面守军作战；一面屡屡电催我迅速率军击破解放军的正面阻击，解救陈明仁部之危。

我接到杜将军一道又一道十万火急的电令后，心情焦虑万分，我知道四平街守军已到了最后关头，不能再拖多久了。倘四平街万一失守，解放军十几万攻城部队随时都有可能迅速南下，与在开原以东的另一部解放军主力前后夹击，将我指挥的这支大军一举聚歼，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于是，我决心倾尽全力，对当面的解放军实施最后的总攻。

6月28日清晨，我偕第93军军长卢浚泉将军等亲临前线指挥。大约晨七时半左右，长官部派出的多架轰炸机

飞临泉头上空，在空中侦察机和地面炮火的指引下，轮番向解放军阵地俯冲投弹，配属第93军的重炮团也集中火力向解放军阵地轰击。顿时，对面解放军阵地上火光闪烁，硝烟弥漫，爆炸声将脚下的大地都震撼得发抖。

轰炸和炮击大约持续了近一小时后，第93军第一线突击队开始发动攻击。这时，解放军的炮火突然回击，大批步兵也纷纷在硝烟中跃出屯兵洞，伏在工事里向正在接近其前沿阵地的国民党攻击部队密集射击、投弹，我方突击队伤亡很大。卢将军见状即命重炮团重新对解放军炮兵进行压制性轰击，并着第93军支援部队集中轻、重机关枪及迫击炮向解放军阵地猛烈扫射，第93军突击部队乘机突入解放军阵地，双方展开激烈的肉搏战，远近的枪炮声、呐喊声响成一片，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

解放军虽然也遭受了很大伤亡，但作战非常顽强，每一寸阵地都不肯轻易放弃，并且不时派出小股部队，进行凶猛的反冲击，给第93军攻击部队很大杀伤。

时至中午，第93军发动的几次较大规模的攻击均遭挫折，除占领了为数不多的几处解放军前沿阵地外，全线无大进展。这时，第93军派出的侦察队前来报告说，自昨天下午起，四平街方向的枪声逐渐稀疏下来，尚不明原因。我心中大惊，以为四平街失守了（后来方知是解放军方面的攻势一度沉寂），极为焦虑，遂命卢将军无论如何要在黄昏前攻破解放军的正面防御。

午后一时左右，第93军左前方传来隆隆炮声，原来是不久前由本溪调来、在该军左翼作战的第53军周福成部正

在向八面城方向攻击前进，由此给正面阻击第93军的解放军部队造成很大的侧翼威胁。我利用这个机会，再次联络空军，并指挥地面炮火，向解放军阵地铺天盖地轰炸、扫射，同时命令长官部炮兵指挥官杨友梅将军，调上全部战车，掩护第93军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不多久，战车部队首先突入解放军阵地，横冲直撞，扩大突破口，后续突击部队趁势拥上，双方混战一团。约午后五时左右，解放军终因伤亡过大，不支退却。我大喜过望，即命卢将军率部全线进行追击，早已奄奄一息的四平街守军此时已知援军接近，士气复振，为策应援军，特派出一支部队向外出击。次日，第93军先头部队进抵半拉山门，与四平街守军会师。第53军及第52军195师也于当日占领了八面城。6月30日，围攻四平街的解放军部队实行全线撤退，四平街之围遂解。这一天正是蒋介石先生下达的解围期限的最后一天。

解放军撤去四平街之围，向北满退却后，我原拟指挥各部乘胜追击，不料新6军14师在威远堡门遭到解放军异常猛烈的进攻，损失惨重，该军军长廖耀湘将军连电向我告急。为此，我只好放弃追击计划，于7月1日派第53军周福成部从泉头车站向威远堡门解放军侧翼攻击。同时，廖将军亦派新22师从正面进攻解放军。经一昼夜激战，解放军主力向西丰、西安方向撤退。历时半个多月的第二次四平街会战算是结束了。

四平街解围的战报传到南京，蒋先生十分高兴，先后授予陈明仁、周福成、廖耀湘等高级将领及“有功”官兵青天白日勋章和云麾勋章，慰勉有加。沈阳城内也接连举

行所谓“庆祝”活动，着实热闹了一番。其实我心里非常明白，此次四平街虽然侥幸解围，但国民党军队受到的损失是相当巨大的。在解放军持续五十天的夏季攻势中，国民党军队有八万余人被歼，丢失县以上城市四十余座，解放军已将其东、西、南、北的根据地联成一片，而我方仅控制着沈阳、长春、锦州、四平、永吉、本溪等十余个战略要点，完全失去了东北战场的主动权。除非出现什么奇迹，否则今后的日子会更难熬了。

当然，今天回顾起来，解放军在那次夏季攻势中，也曾出现过一些失误。例如，解放军5月19日在大黑林子地区歼灭第71军88师之后，倘乘胜向四平街攻击，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混乱的情况下，不仅四平街守不住，就是第71军也有全部被歼的可能。由于解放军忙于分兵略地，攻取东丰、西丰、昌图、开原等地，使陈明仁将军得到将近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整顿部队，安定人心，加强防御工事。解放军因而失去了一个重大胜利的机会。此后在四平街攻坚战中，解放军又犯了轻敌急躁、战术运用失当的错误，致使师久无功，兵员亦受到较大损失，最后不得不实行战略退却。

八 陈诚到东北后的“杰作”

东北解放军的夏季攻势，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也彻底拖垮了杜聿明将军的身体。我由前线回到沈阳后，他已病得难以支持，不得不经蒋介石先生批准，于7月8日离开东北，准备出国治病（后未去成）。他的司令长官职务由我代理。

挚友的离去，使我的心情更加沉重。来到东北不过一年多的光景，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是难以战胜的，担心这样拖下去，将来很难预料会有什么样的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从那时起，我就萌动了借机离开这个灾难之地的想法。

7月12日，参谋总长陈诚将军突然来到东北视察，先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听取局势汇报，并接见苏炳文等东北的知名绅士，以后又到铁岭向新6军官兵授勋。

早在几个月前，就曾谣传说陈诚将来东北主事，他的这番举动，自然更引起了东北各界人士的广泛猜测。行辕主任熊式辉对此事甚感不快，乃接连七次上书蒋介石先生，请求辞职。蒋先生先是不准，一再复信抚慰挽留，后来却不知为何突然下令要熊交卸在东北的工作。熊将军怀着一肚子不满和怨气，愤愤地离开了东北。

八月初旬，陈诚秘密飞临沈阳，接替了熊将军的东北行辕主任职务。他一到东北，立即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规定作战指挥由行辕直接掌握，独揽了东北党政军大权。我则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实际上等于挂名，许多事情都是由陈将军的亲信、另一位副主任罗卓英将军协助他去做。

陈诚到东北之初，的确踌躇满志，颇想有一番作为。他一到东北便公开宣称：“要六个月恢复东北优势，收复东北一切失地！”为此，他锐意整军，大肆扩充部队，先后将东北原有的九个保安区司令部及十一个保安支队及交警总队等部队，扩编为新3军、新5军、新7军、新8军等四个军，把骑兵支队扩编为骑兵师（辖三个旅），又将青年军207师扩编为第6军，并设法从苏北调第49军王铁汉部到东北，另调楚溪春将军为沈阳防守司令官。这样，在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连同原来的新1军、新6军、第52军、第71军、第13军、第93军、第60军、第53军等八个军共达十四个军之多。（以后，驻于热河的第13军拨归华北“剿总”傅作义将军指挥。）此外，陈诚又增加了一些炮兵、战车、汽车等部队。经过这一番整顿扩充，正规军队的人数和装备有了增加，但许多部队的战力却因原建制被打乱、兵力强弱搭配而未得到提高，有的甚至降低了战力。

与此同时，陈诚以整肃军纪、政纪为名，排除异己，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到东北不久，他便接连撤换了包括辽宁省主席徐箴、第71军军长陈明仁、第52军军长梁恺、副军长兼12师师长刘玉章等在内的一批官员和将领。最为滑

稽的是，陈明仁刚刚因死守四平街有功而被授予最高军功章，现在陈诚一到反被撤差查办，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当然，在被陈诚将军查办的人员中，也确实有些人有种种贪污舞弊行为，如汽车兵团团长冯恺、前日本俘侨管理处处长李修业等。不过，东北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并未因陈将军的悉力“整饬”而减轻，相反，在他于东北主事的半年多时间里，不仅内部矛盾更加深化，而且诸如贪污、走私、任用私人等弊端，仍是有增无减。

对于国民党军队前一时在东北战场上的失利，陈诚统统归咎于他的前任官员的无能。记得在7月中下旬召开的一次驻沈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陈将军除了重弹“要消灭共党，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的老调外，还大肆攻击原在东北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将领政治腐败无能，军事指挥失当，致使东北“国军”成了瓮中之鳖，等等。类似这样的话，陈将军无论公开或私下里，都曾说过多次，而且大家都知道他的矛头主要是针对熊式辉、杜聿明两位将军的，但这次他当着众多新闻记者的面，如此刻薄地攻击熊、杜等人，一时舆论哗然，在场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将领们，也多有不平之色。陈诚来到东北不久，他那种惯有的妄自尊大、刚愎自用的态度和作法，就引起了包括东北籍人士在内的许多高级军政官员的强烈不满，大家也不相信他在东北能比熊、杜等人搞得更好，所以均抱着冷眼观望的不合作态度敷衍他。

我对陈诚将军曾有些了解（抗战中期我曾率第8军在他指挥的第六战区作战），知道他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算

是作风比较廉洁的人，做事也喜欢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很有些魄力，且善于辞令，这是他的长处。但他野心很大，一有机会便想吞掉别人的队伍，排斥异己。同时又千方百计地偏袒自己的亲信，培植个人势力，搞得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很深，不少人既怕他，又讨厌他。至于军事上，很难说他有什么过人的“天才”，尤其在指挥大兵团作战方面，他是远不如杜聿明将军的，这一点在后来的东北战场上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验证。不过，后来国民党内许多人士都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的最终覆没，在很大程度上归罪于陈诚将军，这也是欠公正的。其实，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是和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联在一起的。在陈诚将军未到东北之前，就已经注定了的，他到东北来指挥，仅是把失败的可悲命运提前了。

鉴于对陈诚将军的以上认识，使我对国民党政权在东北的前途愈加灰心，加上陈诚将军大权独揽，包办一切，别人无法插手，我也乐得就此逍遥赋闲。同时，暗中寻找机会，准备离开东北，另外他就。这就是那一时期我的实际心情。

陈诚将军来东北就任行辕主任的时候，正值东北解放军的夏季攻势结束不久，秋季攻势尚未开始的空隙，东北战场上相对比较平静，因此使陈诚将军得以从容地整顿军队和部队人事。一切整顿就绪之后，陈氏调兵遣将，跃跃欲试，准备在战场上大显身手了。对于今后的作战方针，陈诚将军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过去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失策是未把北宁路锦州至沈阳段以西的解放军彻底肃

清，致使关外与关内的联系始终有被切断的危险。为此，他首先调集新由苏北调来的第49军及由华北抽出的43师，投入到热河东部地区，企图在短期内将北宁路沈锦线以西地区的解放军一举扫荡干净。

我个人认为，陈诚将军的意图从军事战略角度上讲，在一定意义上是有道理的。1946年8月，我奉命率军进攻热河，其实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但实际上除了占据了北宁路附近的一些战略要点，并未达到消灭解放军有生力量的目的。而这次进攻热河，由于骄傲轻敌，指挥失误，结果就更糟了。

9月初旬，第49军主力和43师奉命分路进攻热河以东地区，不久即遭到热河解放军的猛烈反击，部队损失较大。坐镇沈阳指挥的陈诚将军闻讯十分焦急，急忙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会上，他提出令驻锦州第49军105师向锦州以西杨家杖子出击，策应其它方面的作战。我和其他几位高级将领及幕僚认为锦州西北地区解放军甚多，105师孤军深入，完全有被歼的可能，因而极力反对。会上争来争去，绝大多数人都表示不赞成陈氏的主张。最后，陈诚将军自己也觉得原先的考虑欠妥，乃打消了这个主意，另外做了些部署。岂知会后不知是谁又向他耳朵里灌了什么风，他竟仍令第49军军长王铁汉将军率105师向杨家杖子方向出击。第二天，我们知道这个消息时为时已晚，105师刚一进至杨家杖子，即遭到解放军8纵主力的包围。以后，陈诚将军虽又由锦州派出部队救援，但均为解放军顽强阻击，不得前进。105师待援无望，乃分路突围，途中全部被

解放军追歼，仅军长王铁汉将军率百余人生还。经此一战，暴露出陈诚将军优柔寡断，动摇不定的指挥作风，使在东北的一些原对他抱有希望的人也开始感到灰心了。

解放军歼灭 105 师后，乘胜切断了北宁路，其它几路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陈诚将军指挥的这次作战行动，非但没有消灭解放军主力，自己反而损兵折将，连北宁路也无法畅通了，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为了重新打通北宁路，陈诚将军绞尽了脑汁，但苦于兵力不足，无计可施。于是，他只好请求蒋介石先生下令在华北的傅作义将军出兵援助。不久，傅将军拨出第 92 军和第 104 军，统归侯镜如将军指挥，向热河出击。同时，陈诚将军又调驻长春的新 1 军主力回防沈阳。长春则由以新 1 军的新 38 师为基干扩编成的新 7 军防守。

在打通北宁路之战中，侯镜如将军指挥十分谨慎，他汲取第 49 军上次兵力分散、轻敌冒进的失败教训，采取“集结强大兵力，机动灵活作战”的战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在作战中，每个军的兵力绝不轻易分开使用，使解放军难以各个击破，因而比较顺利地打通了北宁路。

侯镜如将军在北宁路方面的作战成功，给了陈诚将军一定的启示和刺激，他决心打一、两次漂亮仗来扭转东北的战局，挽回自己的面子。他的具体作战方案是：以沈阳及其外围城市为依托，将新 6 军、新 5 军、第 49 军等部队组成一个强大的机动兵团，准备在南满地区，特别是北宁路以西地区，与解放军主力展开决战。

但是，东北解放军为策应北宁路方面的作战。突然于

10月初旬在北满地区发动大规模的秋季攻势，一下子打乱了陈诚将军的部署。

自10月1日起，东北解放军主力1纵、2纵、3纵、4纵、10纵分路向中长路进击，突然向四平街南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击。10月2日，驻守西丰、昌图及威远堡门地区的第53军130师被歼，师长刘润川被俘。驻守开原东南八棵树的守军一个团，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不久，法库、彰武等地亦相继失守。

这下陈诚将军慌了手脚，接连向南京告急。蒋介石先生闻报匆匆飞到沈阳，提出“巩固沈阳及其与关内的交通联系，加强沈阳以北各据点的守备力量，以求确保”的作战方针。据此，蒋先生命将新6军调守铁岭，同时调华北的第92军21师、第94军43师、第13军54师、暂3军10师、11师和骑兵4师等六个师出援东北。

东北解放军见大批国民党军队向沈阳及以北地区增援，忽将主力转向长春、永吉方面作战，以一部兵力围攻永吉，并相继攻克德惠、农安等城。陈诚将军此时已知解放军的厉害，担心部队在增援中被歼，乃令长春、沈阳以北地区的部队不得轻动，故而未曾再遭受大的损失。

这时，活动在热河及辽西地区的解放军与北满解放军遥相呼应，先后歼灭国民党暂51师、暂57师一部或大部，一度夺取了新立屯、黑山、阜新等地，随后又于10月下旬将奉命西援的43师包围击溃。至11月5日，东北解放军的秋季攻势始告结束。

东北解放军的秋季攻势，前后歼灭国民党军队近7万

人，攻占城市 17 座，使东北国民党军队完全处于被分割状态，兵源、粮源及煤电来源都十分困难。陈诚将军的所谓战略计划由此彻底破产了，他的威信也随着战争失利而空前降低，陈诚将军初到东北之际，北宁路及中长路长春沈阳段的火车尚能通行，此时则时断时续，难以畅通，故当时沈阳人民有一句讽刺他的歌谣：“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

面对东北危殆的战局，陈诚将军被迫转而采取“重点防守，保持军力，保住沈阳”的作战方针。这完全是一个消极被动，准备挨打的战略，但在当时，陈诚将军确也只能如此了。不过，他似乎尚未充分预料到今后可能出现的更加危险的局面，在 1948 年元月 1 日发表的“告东北军民书”中，居然侈言“目下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时期已过”云云。并准备派作为战略机动部队的第 9 兵团等部队由铁岭、沈阳、新民三路出兵，向沈阳以西公主屯地区的解放军进攻。但这时东北解放军却先已发起了浩大的冬季攻势，再度打乱了陈诚将军的部署。

当第 9 兵团之新 5 军前进至公主屯时，发现解放军 2 纵、3 纵、6 纵、7 纵等大批主力部队向该军迅速合围。该军军长陈林达将军当即给陈诚将军拍发紧急电报，请求退守设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巨流河。陈诚将军闻报大惊失色，急忙召集行辕的高级幕僚研究对策。行辕副参谋长赵家骧将军主张让新 5 军迅速放弃沈阳外围公主屯等据点，会同各部据守辽河以南及沈阳据点，以攻势防御击破解放军的攻击。对这个作战方案，陈诚将军虽表同意，却迟迟下不了

决心。在公主屯的新5军部队因撤守不定，眼睁睁地看着解放军部队向其四周包围，丧失了突围转移的宝贵时机。直至一天多以后，陈诚将军终于下令新5军向沈阳撤兵，但为时已晚，此时新5军已被解放军重兵团团围住，四面楚歌。元月6日晚，解放军发动总攻，陈林达将军虽曾指挥部队拼命抵抗，并多次发动反冲击，但终于在次日上午全军覆没，军长陈林达将军、师长谢代蒸、留光天将军也在此役中被俘。

在新5军被包围时，廖耀湘将军原可指挥新6军就近解围，廖却畏首畏尾，按兵不动，坐失了救援时机。

在这期间，第49军79师、26师亦先后在彰武、新立屯被歼灭，陈诚将军苦心经营的所谓机动兵团，不到一个月便损失了三分之二。这时，新6军正被迫撤回铁岭，沈阳只有新3军和新1军的两个师驻守，铁西区外围则仅有几个工兵营布防，解放军乘虚兵临沈阳市郊，用大炮轰击铁西区，一时形势万分吃紧。

国民党军队遭受的一连串败绩和沈阳面临着的危险局面，吓得陈诚将军手足失措，卧床不起。他一面匆匆调驻辽阳的第52军主力和驻四平街的第71军主力，星夜集结沈阳，力图稳定局面；一面再次连电向蒋介石先生告急。

元月10日，蒋介石先生亲飞沈阳，当日即召集师长以上将领举行军事会议。会前，据说陈诚将军曾单独与蒋先生进行了谈话，他把东北国民党军队最近的几次惨败，特别是新5军的被歼，完全归咎于众将领不服从命令，并向蒋先生请求惩办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将军，及新6军军

长李涛将军。

参加会议的将领们事先已预感到，此次蒋先生飞临沈阳，很可能要追究失败责任，说不准谁又要成为陈氏的替罪羊，因此大都提心吊胆、忐忑不安。我估计廖耀湘将军在新5军被消灭这件事上，难免要担些风险，故会前即找到随蒋先生同来沈阳的国防部作战次长刘斐先生，请他在必要时为廖讲一下情，刘氏答应试试看。距规定开会时间的最后一、二分钟，脸色铁青、表情严厉的蒋先生才在陈将军的陪同下步入会议室。一见蒋介石先生紧绷着的脸，大家不禁暗暗叫苦，心想今天是“在劫难逃”了。

果然，会议一开始，蒋先生便大发脾气，痛责在东北的众将领指挥无能，作战不力，把好端端的队伍都一批批送掉了。他愤愤地责问众人：“你们当中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当年的‘黄埔精神’都哪里去了？简直是腐败！像这样下去，要亡国了！”蒋先生的浙江口音本来略显尖细，此刻由于过于愤怒，声音都有些发颤了。在场的人吓得无一人敢出大气。

蒋先生整整骂了大约十几分钟，大家以为骂也骂得差不多了，岂知他话锋一转，又接着大骂起廖耀湘将军和李涛将军来，切责其不服从命令，拥兵自保，见死不救，致使新5军全军覆没。声称廖、李二人要对这次惨败负责任。

至此，大家心里都明白了，看来今天陈诚将军的替罪羊必是廖、李两位将军无疑了。我们这些平素与廖、李俩人关系较好的人，不禁暗暗替他们捏着一把汗。

出乎人们的意料，蒋先生刚一讲完话，廖、李二人立

即挺身站起来申辩说，他们从未奉到援救陈林达将军的指示，故不能对新5军的失败负责。而陈诚将军则表示曾嘱罗卓英将军给廖将军打电话，命其就近解新5军之围。这样一来，就形成是非功过无法辨明的僵局。我们这些不了解情况的局外人自然不好插言，就连蒋先生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场面极为尴尬。争吵到最后，陈诚将军在无可奈何中，神情沮丧地站起来说：“新5军的被消灭，完全是我自己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蒋先生原本打算惩办廖、李二人，现在见陈氏自己承担了责任，只好改口说：“仗正在打着，俟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吧”。说罢即离席而去。

蒋先生离席后，陈诚将军接着又说了几句自我检讨的话，最后表示：“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党攻到沈阳的话，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言毕即宣布散会。

会后，蒋先生再次召见各将领点名，勉励大家要服从陈主任的命令，好好地完成东北“剿共”任务。这次他的态度比较和缓，没有再发脾气。

蒋先生在沈阳期间，还作出了一项比较重要的决定，即成立东北“剿匪”总部，并在锦州成立冀辽热边区作战机构，连系华北、东北两个战区。元月17日，卫立煌将军被任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剿匪”总司令，我和范汉杰将军等同时被任命为副总司令，卫氏于元月22日即到沈阳视事。

此时，东北解放军的冬季攻势仍在继续。自元月26日至30日，新立屯、沟帮子、盘山等地先后被解放军占领，

北宁路的交通又告中断。东北解放军主力1纵、2纵、4纵、6纵、7纵、8纵等部队，正大举进攻辽西、辽南的国民党军队。局势日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陈诚将军当初那种目空一切、骄横不可一世的样子再也见不到了，他自知自己留在东北，实在无法应付局面，乃一面连电向蒋介石先生称病辞职，一面要他在南京的夫人谭祥女士搬请宋美龄女士在蒋先生面前疏通，最后总算得到了蒋先生的“恩准”。

2月5日，陈诚将军于风声鹤唳中悄然离开沈阳。他的离去，马上成为沈阳城内的议论中心。特别是许多国民党高级党政军人员，愤愤地骂他是草包，是骗子，口里讲要与沈阳共存亡，但到紧要关头却抛下一切，自己溜之大吉了。一些平时对陈氏不满的人，也趁机群起攻击他。

陈诚将军在离开沈阳之前，一反往常待人矜夸自傲的态度，对我十分亲近，一再拉我陪同他回南京向蒋先生汇报情况。我完全明白，他无非是希望我替他在蒋先生面前作证，证明“国军”在东北的失败，是各将领不服从命令，并非是他指挥失误。我对陈氏在东北的所作所为，早已十分反感，此时更不愿为他说项。无奈陈氏一定要我随去，卫立煌将军也有意让我去南京了解一下各方面的情况。事出无奈，我只好勉强同意随陈氏同机飞往南京。

飞抵南京的当晚，陈诚将军同我一道去晋见蒋先生。见面之后，陈氏先说了些仗没有打好，对不起“总裁”之类的话，然后就讲起在东北的将领们如何如何不服从命令，如何如何难以调动等等，说得头头是道，仿佛在东北的失败

同他一点没有关系。说话间，他不时指点着我说，某某事“总裁”可以问郑副总司令，他可以证明。我心想，当初你把持一切，凡事不容别人过问，现在却要我来证明这个证明那个，岂不是玩笑？因而我只是垂首不语，任由陈氏在蒋先生面前“表演”。

蒋先生默默地听着陈诚将军的诉说，始终没有表示什么。末了，只是要他安心养病，别的事先不要管了。

随后，蒋先生又询问了一下东北战场的近期态势，接着很严肃地对我说：“郑副司令，你在东北时间久些，情况熟悉，要好好协助卫总司令扭转局面。目下东北局势很紧张，你若没有别的事，就赶紧回去罢。”

这次来南京，我本想乘机当面向蒋先生提出调离东北，此时见他这样讲，也只好将已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第二天，我便匆匆飞返沈阳。

以后，国民党内部，特别是东北籍人士，对陈诚将军的攻击日益甚嚣。他不得已，乃奉蒋先生之命，电邀原东北军将领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及东北官绅张元夫、王树常、翟文选、米春霖、于济川等人商讨东北问题，以资拢络。但这些人哪里肯买他的帐，回去后照样起劲地反对他。陈氏的日子很不好过。

声在南京一时油然而起。

此时，陈诚将军正在上海，准备赴美治病，听到南京传来的这些消息吓坏了。他觉得再也无面目出国，又担心真有人跑到上海围攻他，于是便以治病为名，赶快搬到联勤总部上海陆军医院，躲了起来。在蒋先生的庇护下，陈氏总算熬过了这一场大风波。

我至今认为，尽管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的失败早已注定，但陈诚将军被派到东北主持军政大计，对国民党政权来说，仍是一个用人失当的严重错误。陈氏那时无论在国民党政府内部或军队内部，都甚不得人心，加上他本人军事才能平平，却又专断独行，实难独当大任。只因其与蒋介石先生关系密切，故而备受器重，每每被委以重任，结果自然是事与愿违。实际上，国民党政权在东北，乃至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固然源于政治上失去前途，丧尽民心，但其从上至下大搞任人唯亲，裙带风盛行，却不能不说是一个致命的原因。

九 蒋、卫在东北撤守战略上的分歧

陈诚将军走后，蒋介石先生为了安抚勉强同意来东北应付危局的卫立煌将军，决定将国民党在东北的党政军大权完全交给卫，还允诺将陈诚将军在东北期间损失的四个军的十万部队及装备全部恢复充实，并将第54军增调东北战场。2月12日，又正式任命卫将军兼代东北行辕主任。

卫将军是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一位资深历久、军事经验丰富的高级将领，一向为蒋先生所倚重。不过，因为卫氏在抗战初期同共产党方面合作得较好，蒋先生一度对他有些猜疑。这次派卫将军来东北，固然是出于形势所迫，但在蒋先生内心深处，对他仍是不甚放心的。卫将军在东北期间，虽然名义上掌握东北党政军大权，但在许多事情上，并不能完全做得了主。特别是后来蒋、卫二人在东北撤守问题上意见不一，更加剧了彼此间的不信任和矛盾，致使蒋、卫之间，卫氏与在东北的一些将领之间，对于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意见始终无法统一，最后导致了几十万在东北的国民党精锐部队的更加迅速的覆没。

卫立煌将军到东北之后，考虑到陈诚将军失败的教训，转而采取一种持重态度。他认为，依现有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进攻则力量不足，但若防守一些战略要点，

力量还是有余的。故当务之急是积蓄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的变化。据此，他上任伊始，便主张“重新整军”、“固守东北”，提出“固点、联线，扩面”，“重点不重线”等作战方针，一方面努力加强沈阳外围防务，确保沈阳安全，维护沈南水陆交通；另一方面则要长春、锦州、四平街守军固守城池，牵制解放军力量。

这时，东北解放军主力在辽西、辽南的攻势正急如暴风骤雨。2月6日，解放军4纵、6纵部队攻克辽阳，歼守军新5军54师，继而又于2月19日再克鞍山，歼灭第52军25师。同时，解放军3纵、10纵部队攻占法库，追歼守军新6军暂62师，随后乘胜南进，威逼营口，驻守营口的暂58师师长王家善率全师起义，营口又告失守。2月28日，开原亦被解放军攻占。在华北方面作战的聂荣臻元帅，也派出三旅兵力切断了榆关至锦州的交通。又据飞机侦察报告，东北解放军一部在沟帮子、盘山一带构筑坚固阵地，其目的显然是阻止沈阳、锦州两地的国民党军队会合，以便分割而歼灭之。

在解放军的凶猛攻势下，在东北各据点防守的国民党军队阵脚大乱，各地迭电告急。蒋介石先生也格外焦虑，再三电令卫立煌将军派兵解各地守军的围，并打通沈锦线。但卫氏却一概不为所动。他认为解放军的真正意图是围城打援，消灭我军主力，故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所以他不管蒋先生的催逼和四周的风云变幻，仍然坚持自己的既定主张，把主力纷纷集中在沈阳附近，一面大力收揽人心，补充兵员装备，一面加意整军经武，检查督促各部进行军

事训练和实战演习，准备固守沈阳以待时局变化。

但是，蒋介石先生鉴于东北战局的极度恶化，已经失去了保全东北的信心，同时对卫将军在沈阳按兵不动，“以不变应万变”的做法也深感不满，决意将驻沈阳的国民党军队主力撤至锦州一线，与原在锦州、山海关等地的部队联为一体，再图与解放军作进一步的较量。

2月20日，蒋先生专派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罗泽闾、副厅长李树正飞到沈阳与卫将军协商，并提出仅留第53军及207师驻守沈阳，其余主力应尽快从沈阳撤至锦州。

卫将军获悉蒋先生的这个意见后大吃一惊，他没有料到蒋先生竟会这么快就改变了当初亲自向自己许下的全力支持保住东北的诺言。卫氏一向是把沈阳当作一个战略基地来经营的，也下了很大本钱，现在凭蒋先生的一句话便要撤军，当然是想不通的，但又不敢公然违抗蒋先生的意旨，只好分别找身边的高级将领和幕僚商议对策。

在罗、李二人到达沈阳的当晚，我已睡下，忽接卫将军的随从副官打来的电话，说卫总司令有要事相商，请我即刻就去见他。待我匆匆赶至卫将军的寓所时，他已在一间小客厅里等候。我刚刚在沙发上坐下，卫氏就将蒋先生的意见内容向我作了传达。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问：“桂庭，你的意见是怎么办？”我因事出突然，一时不好回答，便推辞说：“还是先听听总司令的意见吧。”卫将军沉吟了一下，方态度犹豫地说：“如果委员长坚持这样决定，我们当然也只好服从。不过，现在放弃沈阳去打通锦州，途中要通过几道河流，加上共军设有几道坚固的阻击阵地，依

我军目前的士气，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稍顷，他又带着试探的口气说：“我们最好能说服委员长，让我们暂时固守沈阳，整训部队，然后再乘机出击，是有希望扭转战局的。况且沈阳有兵工厂，抚顺有汽油，本溪有煤，粮食也可以想办法，完全能够坚持下去。你看如何？”

听了卫将军的话，我心中矛盾重重，半晌没有作声。其实，对于卫将军力图固守沈阳的一套主张，我心里是有看法的。我认为，似这样将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分散困守着十余个孤立的据点，等着被解放军分而治之，在战略上是极其被动的。如能正视战争失利的现实，将主力设法拉出去，将来或许还能卷土重来，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是，我也清楚卫将军所强调的那些困难都是事实。当时在沈阳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打得精疲力竭，士气非常低落，倘一旦失去城市依托，向锦州方面运动，确有可能中途被解放军主力包围消灭，我反复思忖，觉得还是先在沈阳守上一个时期，看情况再打通锦州稳妥些。卫将军见我如此表示，脸上现出笑容，说道：“桂庭也是这样想，我便放心了。明天我们再和其他将领们商议一下，如果大家意见一致，我们就把这个想法报告给委员长。”待我告辞卫氏，返回自己的寓所时，时间已是午夜了。

以后卫将军又征询了赵家骧、廖耀湘等将领的意见，大家也都觉得目前不宜向锦州撤退。卫氏心中有了底，乃决定派我随罗、李二人去南京，当面向蒋先生陈述他的主张。

2月23日，我与罗泽闓、李树正等人同机飞往南京，但这时蒋先生正在庐山休息，我们在南京住了一夜，次日又

飞往江西九江，再由九江乘汽车去庐山。那时庐山上尚无公路，汽车无法通行，车子开到山脚下，我们一行人又改坐轿子上山。这时正是南方的早春季节，山上已现出点点春意。蒋先生的别墅“美庐”，是一座精巧别致的两层灰色洋楼，座落在牯岭中的一片翠竹和树木丛中，门前不远处有一座小桥，清澈的溪水从桥下潺潺流过。景致幽静而秀美，同冰雪覆盖、烽火连天的东北大地截然成了两个世界。但我却无心观赏周围的风景，一路盘算着如何说服蒋先生同意暂缓撤离沈阳。我知道蒋先生的性情固执，担心他不但不能接受我们的意见，反而会在盛怒之下斥责、甚至处罚我们，故心中忐忑不安。

进了蒋先生的寓所，我们一行人刚在楼下的客厅里坐定，身着长袍的蒋先生便从楼上走了下来，我们慌忙起立行礼。也许是经过几天休息的缘故，蒋先生的神色比上两次我在南京见到他时好多了，但表情仍十分严肃，他示意大家同他一起坐下，然后用目光向众人脸上扫了扫，轻轻咳嗽了两声，便转向我问道：“郑副司令，罗厅长他们已经把我的意见转达了吧？卫总司令如何打算，你说说看。”

我稍思索了一下，便将卫立煌将军拟暂时固守沈阳的意图陈述了一遍。蒋介石先生听后皱紧眉头，不加思索地说：“这样不行，大兵团靠空运维持补给，是自取灭亡，只有赶快打出来才是上策，况且锦州方面又可以策应你们。你回去再同卫总司令商议一下，还是想办法向锦州打出来罢。”我赶紧又强调说，解放军已占领锦州至沈阳间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等河流已解冻泛浆，大兵团的辎重

行李很多，很难通过。加上在沈阳的部队缺员很多，战力尚待恢复，非经一段时间整补，否则很难战胜解放军。我本想说我们的军队士气特别低落，一出沈阳就有可能被解放军消灭掉，只是话到嘴边，才改换了一种比较委婉的表达方式。但蒋先生显然连这些话也听不进去，他不耐烦地挥挥手，用很不高兴的腔调责备说：“北伐前，樊钟秀带几千人，由广东穿过几省一直打到河南，难道你们这些黄埔学生连樊钟秀都不如吗，唉？”

蒋先生的这种责备当然不能让我服气。自抗战胜利以来的几年中，我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内部腐败日甚，早年的朝气和革命精神已经丧失殆尽。而我们的对手共产党人，却深得人心，强大无比。倘在作战指挥上不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不分析眼前的敌我态势、兵力对比及士气战力等客观条件，一味凭主观想象来支配行动，军事上焉有不失败之理？但在当时，我内心的这些想法是不敢向蒋先生表白的。

蒋先生见我半晌垂头不语，其他人也都默默无言，便站起身说：“你们先回去吧！郑副司令，你回去告诉卫总司令，叫他不要再迟疑了，赶紧准备由北宁路打往锦州，否则以后会后悔不及的。”

我知道此刻再说什么也没有用处了，只好起身告辞，随众人怏怏下山而去，这是我去东北以来第二次在蒋先生那里碰了壁。

我于2月25日飞返沈阳，立即将情况向卫立煌将军作了汇报。卫氏十分焦虑，于当日下午即召集在沈的将领开

会，研讨蒋先生的指示和方案。大家在会上反复讨论，都觉得此时在沈阳的军队没有把握打通锦州，况且也不能丢下在长春、永吉、四平街等地的十几万军队不管。最后，大家一致表示赞成卫将军的计划。于是，卫将军决定再派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将军、第6军军长罗又伦将军去南京见蒋先生，重申他和在东北的将领们的意见。

蒋先生大约是感到一时难以说服卫立煌将军，这次总算稍稍让了步，允许卫将军“在东北暂保现状”。并指示卫氏：加紧补充训练，一俟部队整训完毕，再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路，将主力移至锦州。

进入3月份以后，解放军又相继占领四平街和永吉。至3月中旬东北解放军发动的持续了三个月的冬季攻势结束时，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只剩下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几个孤立据点。沈阳、长春军民补给全靠飞机运输，而且中航公司自3月8日起决定每日只派四架飞机运输物资救济。

卫立煌将军这时却显得十分冷静。他一面打算将向东北增调的部队及补充兵员运到葫芦岛登陆，并在锦州及沈阳就地补充兵员；另一方面督促各部加紧训练，以期长期固守沈阳。

但是，蒋介石先生始终没有忘记将沈阳的国民党军队主力撤至锦州的主张。3月底，他电召卫立煌将军去南京，拟亲自说服卫氏（这时我已奉命去防守长春）。

在蒋、卫会见过程中，蒋先生以长春、沈阳交通断绝，单凭空运无力维持补给为由，一再要卫氏将沈阳主力撤到

锦州，在沈阳、长春留少数部队防守。卫将军则以部队残破未加整训完成，不可能打到锦州，反而有被消灭的危险为由，坚决反对。二人争论许久，最后卫将军表示，只要蒋先生同意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的全部补给由他设法请美军顾问团帮助运输，这样才使蒋先生再次让了步。但他还是反复叮嘱卫氏，一旦补充整训完成，仍要率主力赶快打通沈锦路。

卫立煌将军见过蒋先生后，经过一番活动，果然得到美军顾问团的大力支援。他回沈阳后，兵员装备给养即源源而来。为着贯彻长期固守长春、沈阳、锦州，锐意经营东北的计划，他终日埋头整军经武，加紧训练部队。

但到了5月初旬，蒋先生又令卫将军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到锦州。并提出除留守沈阳的第53军及207师外，其余各军及特种兵团（战车、炮兵、装甲车、骑兵等）统编为机动兵团，归廖耀湘将军统帅，随时准备行动。这样一来，就等于把在沈阳的卫将军架空了，所以这项主张马上遭到卫将军的强烈抵制，后来始终未能实行。不过从此卫、廖之间也产生了矛盾。

蒋先生见此计不成，又瞩目于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冀辽热边区司令部司令官范汉杰将军，下令要冀辽热边区司令部由秦皇岛移驻锦州（冀辽热边区司令部此时归华北“剿总”和东北“剿总”双重指挥），同时从山东抽调第9军黄淑部、第54军阙汉骞部两个军由葫芦岛登陆，归范将军指挥，要范氏加紧准备打通沈锦路，将沈阳主力拉到锦州。以后虽因卫将军力争，蒋先生同意将冀辽热边区司令部改

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仍由范氏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但由于卫立煌将军一直坚持主张巩固沈阳、锦西、葫芦岛防务，故与手握重兵、专力经营锦州的范汉杰将军之间的矛盾亦日益加深。

这样，由于蒋、卫在东北撤守这个重大战略问题上意见不相统一，甚至彼此拆台，弄得在东北的高级将领们之间也互怀成见，各有所私，既不能及时制定出明确的战略决策，也无法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直至东北解放军于9月间发起最终决定东北国民党军队命运的辽沈战役的时候，国民党政权在东北是撤是守这个问题上，一直处于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状态中。仅此一点可知，在东北的几十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后来竟那样快地被消灭殆尽，也是不足为怪的事情了。

十 部署永吉撤退和受命防守长春

前文说过，我对当时东北的局势早已感到失望，并一直寻找机会从这个令人苦恼的地方脱身。从庐山回到沈阳后，我的心情愈加沉重，积我多年的军事经验，已感觉到蒋、卫之间在东北撤与守这个战略决策问题上僵持不下，拖延时日，势必要将在东北的这几十万军队葬送掉。我决意赶紧设法离开这里，否则将来要走就困难了。

正巧这时我的胃病发作，我觉得这下机会来了，乃于3月初旬的一天晚上单独去见卫将军，当面向他提出要请假到北平就医。卫将军对我这个突如其来的请求仿佛很惊诧，犹豫了一下，便摇头表示不同意，还一再说他可以设法延请名医为我治病，劝我留下。但我执意要走，非要他同意不可。这样谈了近两小时，他见实在无法挽留，才长叹一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告辞时，卫将军亲自送至寓所门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语气凄凉地说：“桂庭，希望你病情好转后，还是赶紧回来罢，不然你们都走了，我一人孤掌难鸣哟！”我闻言心中也很不忍，但随即想到这也许是我的生死关头，不容再有迟疑，便默默地紧握了握他的双手，转身上车离去。

回到自己的住所，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心想在东北熬

了整整两年，费尽了心力，此番总算可以离开这个倒霉的地方了，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我一面连夜发电通知我在上海的家人，要他们先到北平等我；一面打点行装，差人去订飞机票，准备马上就走。

岂知二、三天以后，正待我准备起程上路的时候，情况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据飞机侦察报告，刚刚在辽西、辽南获得大胜的东北解放军主力，正纷纷向四平街方面运动，看样子是要再次攻打四平街。当时驻守四平街的仅有第71军88师主力两个团，兵力十分单薄。卫立煌将军担心四平万一失守，分散在长春、永吉的部队也有可能被解放军各个击破，遂打算放弃永吉，把驻扎在该地的第60军部队集结到长春，以加强长春的防务。卫将军考虑到我对永吉方面的情况熟悉，人事关系也比较好，乃临时改变主意，决定派我和参谋长赵家骧将军一道去部署永吉的撤退。

卫将军的这个决定打乱了我离开东北的计划，使我心中懊恼不已。但考虑到自己身为军人，在这个严重时刻不容讨价还价，所以还是接受了任务。我忍痛退掉了去北平的机票，并通知家人暂缓去北平，然后偕赵家骧将军匆匆飞往永吉安排部署撤退事宜。

临飞长春前，我曾找卫立煌将军谈话，郑重地建议在放弃永吉的同时，也放弃长春。我认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解放军吃掉的可能性很大，与其将来坐待被歼灭，不如主动提早放弃，将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这样尚能战、能守、能退，还可以保存一部分有生

力量。卫将军听了这个建议不置可否，只是表示，这件事关系重大，他要请示一下委员长再说。当晚，卫将军再次约我谈话，据称蒋先生已明确指示要固守长春。他说，蒋先生担心放弃长春对国际影响太大，认为固守长春可以吸引一部分敌人兵力，减轻敌人对沈阳、锦州的压力。况且从长远看，今天放弃容易，将来要占领就困难了。我听了卫将军传达的蒋先生的这个指示，心中颇不以为然。道理很明显，打了胜仗，不但长春可以收复，整个东北都可以占有；打了败仗，一切都完了，还谈得上什么国际影响？但我很清楚，既然蒋先生已经作出决定，此时此刻我再说什么也是无用，遂不再表示异议。

3月8日清晨，我与赵家骧将军秘密飞抵永吉，当即前往第60军军部，向该军军长曾泽生将军等军师将领传达了立即向长春撤退的命令。由于事出突然，曾将军听了命令后楞了一下，好像没听清楚似地问：“什么时候撤？”我加重语气重复说：“今晚就开始行动，限两天之内取道放牛沟之线到达长春。”“这，这太紧张啦！官兵没有一点准备，暂21师还有两个团驻在乌拉街、江密峰等地，请副总司令和参谋长能不能稍微宽限一下时间？”曾将军望望我，又望望赵家骧将军，有些为难地请求道。我正要说话，赵将军在一旁接上说：“不行啊，曾军长。永吉距长春二百余里地，周围都有解放军出没，万一走漏风声，第60军就出不去了，兵贵神速，还是出其不意，马上就行动好些。”曾军长思忖了一下，表示服从命令，其他各师将领也没有异议。随后，我们又对照地图，详细研究了第60军的具体撤退路线、行

军序列，以及新七军部队的接应地点等问题。此外，我还根据东北“剿总”的指示，命令曾部于撤退前破坏小丰满电力厂，并将弹药、粮秣等无法携带的军需物资全部焚毁或破坏掉。不过，后来曾泽生将军以避免暴露军事行动企图为由，没有执行这道命令，才使大批宝贵的物资财富，特别是耗费了东北人民无数血汗的小丰满电力厂，得以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

一切布置停当，我和赵家骧将军又急忙飞往长春，安排长春方面的接应工作。当飞机在长春大房身机场徐徐降落时，时间已是当日中午，新7军军长李鸿将军等将领和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等在机场迎候。从机场回到城内新7军军部，我和赵家骧将军马上召开会议。向李鸿将军等通报了第60军将在近一、二日内由永吉撤到长春的情况，指示新7军应迅即派出一支有力部队，抢先占领放牛沟一带险要阵地，策应第60军行动。同时又叮嘱尚传道市长亦急速在市内准备好第60军的营房以及随军撤退人员的食宿。考虑到第60军属云南军队，素受中央军排挤和歧视，我特地在会上反复告诫李鸿将军等新7军将领，不得以王牌军自居，看不起曾将军的部队。尤其是第60军初到，新7军应予照顾，努力加强两军团结，共同坚守长春等等。这些话说归说了，但事实上后来歧视第60军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只是没有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

当时，我最担忧的是怕第60军撤退途中遭到解放军攻击，不能安全抵达长春，乃一面电请东北“剿总”派出飞机侦察长春、永吉间的解放军动向，一面要李鸿将军及时

将派出的接应部队的情况向我报告，并指示他向第60军撤退方向派出便衣谍报人员进行侦查活动。此后一连两天，我都是在万分焦虑中度过的。

后来得知，在我离开永吉的当天午夜，第60军和吉林保安旅开始依照命令撤退，省府官员和部分事先知道消息的地方豪绅、学生等也掺杂在队伍中行动。由于撤退路上积雪甚厚，车马不易通行，第60军各部队几乎将所有汽车、重武器都破坏或丢弃了，其它装备和物资扔掉的也不少，许多官兵及眷属连多余的衣物都未能带上，可见当时的处境是十分窘迫的。

第60军撤离永吉之初，由于未在市区及小丰满电力厂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加之行动突然，解放军似乎没有发觉。但部队于10日傍晚行至太平岭附近时，终于遭到解放军一旅兵力的猛烈阻击，在第60军右翼向前行进的吉林保安旅首先被击溃。曾将军指挥第60军182师、暂21师一部及军属特务营经几小时激战，始冲破解放军阻击，使全军脱离险境。但负责殿后的第60军输送团在战斗中遭到相当损失，连该团团长潘尧也被解放军生俘了。直到11日晨，饥疲交加的第60军及吉林保安旅才涉过饮马河，在放牛沟与新38师师长史说率领的接应部队会合，并于当天中午陆续开入长春。至此，我紧张、焦虑的心情才缓和下来。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先生对第60军的这次撤退行动十分满意，一再称赞说：“吉林撤退是最成功的一次战略撤退。”一些中外右翼报纸和通讯社也乘机大肆吹嘘，把它誉为“东方敦克尔克最成功的撤退”。但我心里非常清楚，这

次虽然是安全撤退，部队未遭受大的损失，而军心士气却受到很大影响，军队内部悲观失望的情绪更加普遍了，从军事角度上看，东北国民党军队的处境也更加险恶了。

就在第60军撤至长春的第二天，即3月12日清晨，东北解放军1纵、3纵、7纵和炮兵部队在2纵、8纵、10纵及独立师部队的配合下，向四平街发动总攻。解放军攻城部队首先夺取了四平街市郊的制高点，然后以火炮猛轰城内，压制住守军的回击炮火，继以步兵突破该市东南段城墙，涌入市区，双方展开激烈巷战。至13日晨，四平街守军第71军88师主力两个团及新1军、第71军留守部队均被歼灭，解放军完全控制了该市。这次被人们称为第三次四平街会战的战役，终以国民党军队的惨败告终了。

这样，东北国民党军队在一星期内接连丢失了两个省会（永吉市为当时吉林省省会、四平街为当时辽北省省会），长春则成了一个战略上的孤岛，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第60军撤到长春后，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将军即先期飞返沈阳，向卫立煌将军汇报情况，我留下来布置长春的防务。依我自己的打算，准备一俟处理好长春的事情，便赶紧飞返沈阳，继续我原来去北平“治病”的计划。但偏偏是事与愿违，就在这时，我接到卫立煌将军在沈阳发来的电报，他希望我留在长春，兼任刚刚组建成的第一兵团司令官，并接替梁华盛将军的吉林省主席职务（梁氏已于永吉撤退前回到沈阳）。

卫将军的这道电报，使我非常恼火。谁都知道，长春

远离沈阳主力，已处于解放军战略包围之中，处境非常危险。这时候要将我派到这里长期镇守，不是把我往火坑里送么？况且卫氏做出这样的决定，事前竟不同我打个招呼，更令我不快。所以。我未理睬卫将军的命令，将长春防务部署完毕即匆匆飞返沈阳。

回到沈阳后，卫立煌将军见到我，故意显出惊讶的样子，问道：“桂庭，不是要你留在那里吗，你怎么又回来了？”我有些没好气地回答：“请总司令还是另择良将吧，长春我不去，我还是要到北平去治病！”卫氏有些难堪地笑了笑，却没有动气，语气很和缓地说：“桂庭，目前这种情势，你还是不要走了罢。要你到长春，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委员长也是这么主张的。”我赌气地说：“不管怎么讲，长春我是不去的！”言毕，即起身告退了。这是我和卫将军之间唯一的一次不愉快的谈话。

这样僵持了几天，我又接到蒋介石先生发来的一封带有命令口气的电报，一定要我到长春负军政的责任。蒋先生亲自给我下这样的命令，使我不能不有所考虑了。去，还是不去？我思想上斗争得很厉害。去长春，显然是死路一条，恐怕很难生还；不去，就要冒公然违抗蒋先生命令的风险。而那时我受“忠君”的封建思想影响较深，加以多年来受蒋先生用曾国藩的榜样培养教育的结果，使我养成了“服从命令，安分守己”的作风。这也正是我一向深受蒋先生信任的原因之一。所以，此时我不愿，也不敢不听他的话。

正在我迟疑难决之际，我在东北的一些朋友，如第9兵

团司令官廖耀湘将军、第52军军长覃异之将军、新6军副军长舒适存将军等知道消息后，都相继来劝我不要接受这个危险的任务。廖、舒二人向我建议说：最好能要求卫立煌将军让梁华盛将军继续主持长春军政事务，或请求在锦州的范汉杰将军与我对调。我思来想去，觉得现在也只有用这个办法去碰碰运气了，乃去卫立煌将军的住处向他谈了上述意见。

卫将军听了我的要求，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半晌方说：“桂庭，梁副司令与曾军长关系搞得很紧张，你是知道的，他到那里不便指挥作战。范副司令对长春的情况也不熟悉，我们反复考虑，只有你去比较合适。”他说着站起身，在室内踱了几步，重在我身边坐下，很恳切地继续说：“桂庭，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彼此都很了解。说实话，我也知道长春很危险，不太情愿让你担这种风险。可现在局面坏到这种地步，实在是没有别的法了好想呀。我辈身为军人，应以‘党国’利益为重，请不要再推辞了。况且长春工事坚固，兵力雄厚，只要认真防守，是可以坚守下去的。你去之后，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来，我一定全力支持你。”

卫氏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使我颇为感动。我没有再说什么，便默默地起身告辞了。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我知道，去与不去长春必须下决断了。想起白天卫将军讲的那番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从维护国民党政权的角度上看，我去长春确实比范、梁等人合适些。一来我情况熟悉，二来在长春的新7军将领，如李鸿、史说、邓士富、龙国钧等都是我在

驻印军时的部属，平日私交甚好。至于曾泽生将军等第60军将领，也与我素无矛盾，因此我在那里坐镇指挥比较便利。这也许就是蒋、卫派我去长春的用意所在吧。就我个人来说，去长春固然很危险，但在沈阳、锦州又何尝不危险？实际上整个国民党政权都在危险之中，倘有一天国民党垮台了，我们这些人有谁能走得掉呢？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困难的时候，我不负责，由谁负责？相反，我若坚决不去长春，就算今后能侥幸保全性命，但自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位和声誉就可能完结了。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比死都难受的事情，愈这样想着，我愈觉得长春非去不可了，最后终于咬咬牙，下定了去的决心。

第二天上午，我去见卫立煌将军，表示愿意接受去长春的任务。卫氏闻言大喜，高兴地搓着手连声说：“好！好！”接着又慰勉了我一番，并留我在他那里吃了一餐丰盛的酒饭。

为了组建新成立的第一兵团司令部，我在沈阳又耽搁了几天，网罗了一批军官，直到3月中下旬，才怀着一种“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心情，飞抵长春赴任。

我飞离沈阳前，许多朋友赶来看我。大家知道局势险恶，前途未卜，也许说不定这就是今生最后一次见面了，彼此都有点生离死别的感觉。廖耀湘将军与我共事多年，一起共过患难，对我更为关切，分手时他还一再埋怨我：“桂公（一些部属和朋友对我的尊称）为人也太厚道了，长春是不该你去的。卫总司令这样决定，不是把你往虎口里送

么？”我苦笑着摇摇头，没有说话。他自觉有些失言，又改口道：“将来万一事情不可为，请桂公率队伍向西南方向突围，那里共军兵力空虚，我到时也一定设法接应你们。”我知道这是他的好意安慰，心中既感激又酸楚，心想到了那种时候，我们谁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纵然想彼此救援，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3月25日，我在长春励志社大礼堂宣誓就职。为了鼓舞士气，在就职仪式上我向在场的众多文武官员宣布了蒋介石先生为我们规定的“固守待援，相机出击”的战略任务，要求大家精诚团结，共守长春，只待蒋委员长指挥大军出关增援，我们即转入战略反攻，云云。随后，就职仪式就草草结束了。

从那时以后，直至这年10月长春和平解放前夕，我度过了一生最为艰难和痛苦的一段时光。

十一 困守长春

1948年3月底前后的长春，已处于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除城郊仅有的大房身机场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被切断，城内粮食、燃料匮乏，军队士气低落，民众惶恐不安。我到长春后，立即着手整顿防务，安定人心，以图长期固守。其作法是：“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

当时，城内的守军主要是新7军和第60军，以及第1兵团直属部队、长春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新1军留守处部队、青年教导第1团、吉林师管区、联勤16兵站支部、驻长空军部队等部。此外还有一些地方保安部队，共十万余人。

新7军是陈诚将军于1947年冬以新1军之新38师为基础，加上由原保安第12支队改编的暂61师，和由原刘德溥部的保安区改编的暂56师扩编而成的，总兵力有三万余人。原新38师师长李鸿任军长。在该军所辖三个师中，新38师自开入东北后，虽累遭损失，但基本上保存了驻印军时的老班底，经补充后兵员达一万二千人左右，装备亦好，是长春守军中最为精锐的部队，此时由原新1军参谋长史说将军任师长；暂56师的前身是原伪满铁石部队，后

经收编由关内空运东北，在战场上屡遭败绩，改编为暂 56 师时虽有七千余众，但战力极弱。该师师长原为刘德溥，后因与暂 56 师原来同为伪满部队的暂 58 师王家善部在营口起义，恐其不稳，遂调新 7 军参谋长张炳言接任该师师长；暂 61 师系由地方团队改编而成，虽经训练，人数亦有七千余人，但战力也仅稍强于暂 56 师，原新 38 师副师长邓士富任师长。该军另有直属部队四千余人。因此，号称所谓“王牌军”的新 7 军，其实也只有新 38 师一个师尚称能战，其余两师则徒有虚名。

第 60 军是云南部队，成立较久，全军约二万余人，该军开入东北后，多次遭受解放军打击，特别是在 1947 年冬永吉守备战中损失甚重，以后虽经补充，但一直未能恢复元气。第 60 军下辖三个师，其中 182 师兵力约一万人，实力较强，师长为白肇学；暂 21 师兵力约九千余人，战力较弱，师长为陇耀；暂 52 师系在永吉时由交警总队改编拨归第 60 军指挥的部队，有六千余人，但内部成份复杂，训练很差，基本上没有什么战力，该师师长是李嵩。此外，第 60 军还有一个预备师，约七千人，多是新兵。

根据我 3 月中旬作出的长春城防布置，新 7 军和第 60 军以该市中山路、中央大街（今斯大林大街）为界，新 7 军防守西半部，第 60 军防守东半部。3 月下旬，我再度来长春后，除命新 7 军暂 56 师加强在西郊大房身机场及西门至机场一线的守备力量，并着第 60 军派出暂 52 师控制东郊城防工事外的一些高地和独立据点外，没有再在兵力和配备上作出大的变动。

长春位于东北腹地，是贯通中长路、长图铁路及东北境内各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东北沦陷后，伪满州国曾以这里作为其“首都”。在日本法西斯军队占领时期，曾在城内街道及近郊区修筑了许多永久性、半永久性工事，如碉堡、壕沟、坑道、瞭望台等，样样俱全。城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等四个高大建筑物，矗立在十字路口的四角上，前三座建筑物的地下室，均有钢筋水泥筑成的坑道通过宽阔的马路，彼此相连。更有笨重的铁闸门，可以彼此隔绝。四座建筑物的地上部分，都是厚墙铁窗加上钢筋水泥屋顶，连中型飞机的炸弹都不能损伤它们。再往南去的中央大街西侧，还有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这是一座异常坚固的建筑物，全部外墙均用花岗石砌成，厚度在一米以上。室内可储存大批弹药、粮食、淡水，还可自行发电。我的兵团司令部以后就设置在这里。市内各主要街道都宽约六十米左右，街与街之间和各大建筑物之间都留有许多草坪、花园空地，距离足够发扬火力。重要的街口还修筑有水泥地堡。国民党军队占据长春后，于1947年秋季起，又环市构筑了很多钢筋水泥地堡，并用战壕将其联系起来。城四周还设有宽三米、深二米的外壕，壕内有纵射火力点，壕外则架设铁丝网等障碍物，使整个长春在日本侵略军遗留工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防御体系的城市。我奉命镇守长春后，本着持久防御方针，又加紧巩固完善原有防御设施，以市中心为核心，层层设防，在市内外组织了多道防线。我还抽空到各重要地段视察，亲自督促各部

加强防御工事，以备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我特地指示各处阵地加设隐蔽的侧射、斜射火力，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火器的威力。

为了恢复和提高第60军的战力，加强长春东半部守备区的防卫力量，我还下令将新7军的一些汽车、大炮等重装备拨归第60军使用，并将新7军的一个重炮连配属60军指挥。

经过这些努力，我自信长春城防固若金汤，可以同解放军较量一番了。

在整顿长春防务过程中，令我十分头痛的是如何处置那些地方游杂部队。这些部队多是地主武装，素来战力不足，骚扰百姓有余。为了巩固城内秩序，我起初曾下令一律不准他们进城，以后这些游杂部队的“司令”们常常找我闹着要钱要粮，他们每个人都自称有几千甚至几万部队，我派人去调查，发现其中许多是无兵司令，或者是谎报人数，以图骗取钱粮。更有甚者，他们彼此间还为抢占地盘，争夺部队而内讧，经常发现一个部队有几个司令的情形，搞得乌烟瘴气，十分混乱。于是我下决心将其中素质好些的编成两个骑兵团，新7军亦收编了一个骑兵团，使其参加市区防务，其余的干脆逐出城外，任其自生自灭。这下城郊的百姓更遭了殃，那些反动地主、胡匪，纪律本来就坏，一旦断了粮饷，就愈要以劫掠为生。他们每到一处，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使百姓们恨之入骨。但我这个时候已顾不上这些，惟有听之任之了。

为了提高士气，巩固内部，增强军政官员们长期固守

的信心，我采取蒋介石先生办中央训练团的那一套办法，举办各种短期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干部受训。首先于4月间开办的是吉林省军政干部训练班，我兼任主任，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先生、省民政厅长兼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省保安副司令李寓春将军等任副主任。学员多是从永吉逃来的一批国民党吉林省政府、永吉市政府、吉林省政工大队等机关的人员，共四百余人。这批人结业后，有的派充吉林省保安旅的下级军官，有的安插在长春市政府中。5月间，新7军也举办了一期干部训练班，主要是培训该军连排级干部。到了7月至9月间，我又亲自在励志社开办了三期兵团干部训练班，培训第1兵团直属机关和新7军、第60军师级以下干部，在这些训练班上，我每次都亲临主持讲话，借以维系士气。直至9月下旬，由于局势极度恶化，这种训练班才被迫停办了。

此外，在5、6月份我以省主席的地位，要教育厅负责整顿长春市的学校，把学生组织起来，以免闹事。后来因为粮食困难，大多数学校无形停顿。当时为了收容各地逃来的学生，成立了一个幼年兵团。以后把长春市的高小和初中学生，也编入其中，目的是把他们集中起来，既防他们饿死，又可避免到处滋事，影响治安，这也是巩固内部的一种措施。我并想在围城之中保持弦歌之声，借以安定人心。

考虑到欲固守长春，第60军是一支重要力量。为了减轻该军对历来遭受歧视的不满心理，我到长春不久，即保荐曾泽生将军兼任第1兵团副司令官，以资笼络。平时，我

经常请曾将军到我家里吃饭、谈话，彼此交换意见，努力建立起一种私人间相互信任和友好的关系。尽管在固守长春期间，我与曾泽生将军相处甚好，甚至到全国解放后，我们之间还常相往还，但那个时候，若想彻底消除所谓“王牌军”和“杂牌军”之间的隔阂，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只好私下里不断提醒、告诫兼任长春警备司令的李鸿将军等新7军将领，注意和第60军“同舟共济”，搞好团结。对于两军间出现的一些小摩擦，我也多采取“和稀泥”的态度。

5月20日，蒋介石先生于“竞选”的闹剧中获胜，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为了进行宣传，也为了鼓舞士气，我特地下令于当天在长春组织了一次庆祝大会。会后，在长春警备司令部主持下，由新7军和第60军联合举行阅兵典礼。那天，我和在长春的所有高级军政官员都出席了仪式。参加阅兵的部队主要是新7军新38师和第60军182师等部队。当时，大家都感到前途渺茫，忧虑重重。我作为长春最高军政长官，虽然不得不强打精神，讲一些豪言壮语给人们打气，但自己心里也很空虚。

这时，我已据可靠情报获悉，进入5月份以来，长春四周的解放军调动频繁，并有大批部队正源源开来，估计连同原来的围城部队，兵力在三、四个纵队以上。我判断解放军极有可能先打长春，然后再掉头南下对付沈阳、锦州。虽然长春城防坚固，但依现在的士气民心能支撑多久？我心中没有任何把握。当全美械装备的新38师部队整整齐齐地在检阅台前通过时，我心头突然袭扰上一股难以名状

的伤感情绪。该师是我非常熟悉并引为自豪的一支部队，抗战期间曾在印缅战场上纵横驰骋，屡建奇勋，成为名扬中外的抗日劲旅。自进入东北参加内战以来，这支以往英勇善战的部队却累遭打击，士气下降，现在又随我陷入如此困境，将来还不知有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正沉思间，站在我身后的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将军（参谋长一职始终空缺）轻轻用手臂碰碰我，说：“司令官，部队已检阅完了”。我定神一看，果然街上已空荡荡的，街道两旁冷冷清清的旁观群众，也开始陆续散去，这个所谓庆祝仪式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当时的气氛倒真像是举行一次葬礼。

就在第二天，我指挥长春守军沿飞机场方向发起了一次大规模出击行动。这次行动是由我和杨友梅、曾泽生、李鸿等几位将军共同策划的，目的在于乘解放军发动攻城战役前争取主动，解除解放军对机场的威胁和骚扰，确保机场安全。同时，也打算搜购一些粮食。

这天清晨，新7军新38师主力和暂61师一部突然由西门向外出击，沿飞机场以北向西北方向突击，作为预备队的第60军182师也随后迅速跟进。最初，战况似乎比较顺利，解放军进行小规模抵抗后，便节节后退，新38师于当天下午占领了距长春西北约六十里外的小合隆镇。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当即偕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将军等驱车前往小合隆镇一带巡视。小合隆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镇，只有几十间低矮破旧的房屋，新38师临时师部就设在镇上。我在师部简单了解了一些情况，指示新38师师长史说抓紧在附近地区扫荡，搜购粮食；同时派出一部分部队在

大房身机场外围构筑工事，将解放军阻挡在火炮射程以外。黄昏前，我和杨友梅将军等又匆匆赶回城内。

24日，情况突然发生逆转。解放军乘长春守军主力北调，集中大批部队由东西南三面围攻长春，并以二个师以上的兵力猛攻西郊大房身机场。担任机场守备的暂56师一个团，一战即溃，很就被消灭干净，解放军控制了整个机场。接着，防守长春西门至机场一线的该师其他部队也遭到解放军猛袭，损失惨重，残部仓皇退回城内。这时，长春四郊都有激战、炮声隆隆，城内人心惶恐异常，各部队指挥官纷纷向我告急，我才知道中了解放军的诱敌之计。此刻，城内精锐尽出，倘再迟延，不仅长春城防危险，就连在长春市外活动的两个半师也有被解放军分割歼灭的可能。我见情势不妙，当即决定将新38师等出击部队撤回，并命史说率新38师及暂61师一部乘解放军立足未稳，迅速夺回机场。

当天中午，新38师与占领大房身机场的解放军发生激战。史说首先投入两个团的兵力进攻机场，并以大炮轰击机场外围的各坚固据点。正当双方酣战之际，解放军主力一部突然由侧翼拦腰向我袭击，来势非常凶猛，在新38师右翼担任掩护的暂61师部队当即被冲垮，部队四下溃散。解放军趁势猛打猛冲，一直逼迫到设在通往机场的公路旁的新38师师部附近，双方短兵相接，展开极为剧烈的战斗。此时解放军人数愈来愈多，攻势愈来愈猛，新38师师直部队有些抵敌不住，渐呈动摇之势。左右见情况危急，均劝史说先将炮兵撤下，再率师部及后边一个团撤退。史说考虑

炮兵一撤，军心将更加动摇，纵然能率后卫团侥幸逃回，前边攻打机场的两个团则必遭歼灭无疑了，因此惟有硬着头皮顶住。他一面命令炮兵及所有轻重武器一起向解放军猛烈回击，一面让后卫团跑步向上增援。无奈众皆不敢恋战，纷纷打算后撤，史说见状又气又急，命卫士就地打开铺盖，躺在上面怒气冲冲地骂道：“我就睡在这里了，看你们哪个要退？！”左右见主官如此，遂不忍相弃，只好返身悉力抵抗。不多时，后卫部队赶至，解放军乃稍退。史说这才得以将攻打机场的两个团撤下来，并收拢溃散了的暂 61 师部队，匆匆退回城内。解放军见目的已基本达到，况且长春城防坚固，一时难下，也退兵而去。

这一仗我们败得很惨，不仅粮食颗粒未得，部队也遭到严重损失。暂 56 师有两团以上兵力被歼，收集残部仅得二千余人，暂 61 师亦损失了约两个营。惟新 38 师得以基本保全。最糟糕的还是机场丢失了。从此，长春、沈阳间的这一唯一的空中交通也彻底断绝了，守军只好龟缩城内，再也不敢轻易大规模出击。

解放军占领了长春西郊大房身机场后，似乎放弃了强攻硬打的打算，转而采取了长围久困的方针，进一步加紧了对长春的包围。同时，在具体战术上，解放军亦由过去的远困改为近逼，双方火线距离，近处仅一百公尺，远处不过千多公尺。不时发生零星炮战和小规模交火。以前长春守军还可依靠空运维持补给，并不时派出小部队四出劫粮，此时机场失守，部队均被封锁在哨卡内动弹不得，使原来就极为困难的粮食及燃料问题更加艰难了。

我奉命防守长春时，该市哨卡线内外居民有五十余万人，加上军队、军官眷属、公教人员及警察近七十万人。我当时就预感到，今后欲长期固守，粮食将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因此，我上任伊始，便决定乘解放军尚未合围，抓紧抢购军粮。除拨出“东北流通券”，由新7军、第60军及保安旅等部队自行采购以外，并令吉林省粮政局和长春市田粮管理处分别代为抢购。从3月下旬至5月下旬之间，先后大约购军粮三百万斤左右。新7军驻长春较久，自1947年冬以来已积储了一些粮食，后来又从商人手中购买了一大批因交通中断、无法外运的大豆、豆饼做马秣。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也购买了一批大豆作为市属公教人员的粮食储备。第60军因新由永吉调来长春，毫无粮秣储备，除现购现吃外，只好从新7军存储的马秣中分出一半备用。大约4月中旬，我曾嘱尚传道先生在市内进行一次户口清查和余粮登记。后来统计的结果表明，按当时市内的居住人口和存粮数，市内存粮只能吃到7月底为止。为此，我日夜焦虑不安，一面屡电卫立煌将军加紧空运补给，一面命人绞尽脑汁地继续在市內及四郊搜粮食。

进入6月份以后，长春四面被解放军合围，郊区粮源断绝，市内存粮日益减少，粮食投机倒把随之盛行，粮价一日数涨，市场混乱，人心更加不安。屯积居奇的粮食数量虽不太多，对市场的影响却很大。最初高粱米只几元一斤，最后竟涨至三亿元一斤。由飞机空投一万元一张的钞票已无用处，我不得不要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本票，票面数字最初是几十万元一张的，后来提高到几十亿元，甚

至几百亿元一张，临到长春快解放前，一两黄金也换不得几斤高粱米，货币实际上已失去作用了。当时，市内税款收入，尚不够税务人员的伙食开支，徒然扰民而于财政无补。我干脆下令暂时撤销一切税收。后来把终日无事可干的省政府工作人员也纷纷遣散了（因为国民党在吉林省的控制范围不出长春市，省政府徒有虚名）。

最令我恼火的是，新7军的个别军官竟背地里参予粮食投机活动，事发后影响极坏。为了安定人心，我不顾李鸿、曾泽生将军的再三求情，下令枪毙了一名营私舞弊、倒卖买粮的军需官，以杀一儆百。但对其他人却未敢深究，因为我也担心操之过急，很可能激出事变。

当时，新7军的日子还好过些，第60军的处境就非常困难了。自长春被困以后，该军官兵先是吃豆饼掺高粱米，以后高粱米吃光了，只好去酒坊挖陈年酒糟来吃。有的连酒糟也挖不到，只好去抢。特别是第60军暂52师官兵，一见哪家居民烟囱冒烟，便去抢粮，弄得那一片防区内的老百姓有点粮食也不敢举炊，怨声沸沸。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长春日报》上披露了此事，并宣传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结果引起了曾泽生将军很大不满，他为此事专门找我，气愤地提出抗议。我只好抚慰他一番，并替尚先生作了些解释，委婉地劝他尽量设法约束士兵，免生意外。

在粮食紧张的同时，城内的燃料也将用尽了。一些部队、机关开始拆无人居住的房屋当柴烧，后来连市内树木、柏油路也遭到砍伐、挖掘，虽一再明令制止，亦无济于事。

为了解决燃料不足的问题，我曾企图在长春东郊开采煤矿。特命第60军暂52师自农学院向外出击，但很快遭到解放军迎头痛击，损失惨重，该师第3团团长沙让等二百余官兵被击毙，余部只得狼狈退回。

我感到这种局面很难支撑下去了，一面继续电请卫立煌将军加紧空投粮食，一面发动各军师长官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先生，诉说困守长春的艰苦情况，请他速想办法。不久，我和各军师长官分别收到蒋先生的复电。他在电报中除了用好言抚慰我们以外，仍是要我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住长春，等待他派大军前来救援。在给我本人的电报中，蒋先生还特别命令我将长春城内人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以期度过眼前难关。

我明白蒋先生的这道命令完全是个“杀民养军”的办法，但又苦无他计，只好分别找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先生和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商议措施。他们见了蒋先生的命令也都连连摇头，说千万使不得，如果这样一来，城内必定要大乱了。我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复电给蒋先生，表示很难执行这个命令。为了制定出一个粮食管理办法，以后我还是指定崔垂言先生、尚传道先生等人，共同拟订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草案》，其中规定：允许人民留自吃粮食到9月底，剩余粮食一半卖给政府作军粮，一半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各保组织粮食管制委员会，由保内缺粮吃的市民派代表参加工作；买卖粮食均应按照政府议定的价格，不许哄抬粮价，凡违反该法令的，均处以

极刑。

这道当时被称为“战时粮管法令”的条令公布后，有些暗中与军队勾结的商人，自恃有后台支持，依然我行我素，抬高粮价抢购。我知道后很生气，亲自批准处决了三名被查获的“不法”商人，以后市场上的情况一度稍稍好些，但民间存粮毕竟有限，几经折腾，也未搜集到多少粮食。

到了8、9月份，长春已在山穷水尽的边缘了。军队因长期吃豆饼酒糟，许多官兵得了浮肿病，虚弱得难以行走。各部队指挥官和地方行政长官几乎天天来找我，请求设法解决粮食、燃料之急需，我为此焦急得食不甘味，席不安枕。我曾设想利用市内宽阔的马路，开辟出一个简易机杨，以进行空运。但工程刚开始，马上就招来解放军的猛烈炮火，只得作罢。无奈，我只好再三哀请蒋介石先生和卫立煌将军增加空投。奇怪的是，我电报催得愈急，飞机来得愈少。开始每天还有十一、二架飞机来空投，以后减到每天三、四架，而且一逢阴天下雨就停飞。这点粮食对于十万大军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尤其恼人的是，空军与新7军曾有摩擦，因此飞行员执行任务时就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飞机飞得既高，又不按规定办法投掷，结果常把许多粮食误投到解放军的阵地上，官兵气得直骂。

我曾规定，每次空投的粮食，由兵团司令部负责收集，统筹分配各部队。但由于空投不准确，一些米包落到指定地点以外，立刻引来成批饥饿的军民蜂拥抢夺，甚至彼此展开械斗。我怕引起大的混乱，亲自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

命令，大意是：今后凡有不顾法纪，仍敢擅自抢藏空投物资者，一经查获，即予就地枪决。但此后这类事情还是时有发生。盖因在极度饥饿威胁下的人们，已无法再以纪律和命令来有效约束了。

当时军队的缺粮情况如此，一般市民的处境就更惨了。自7月以来，市内已有饿殍出现。许多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我虽下令追查，但也不了了之。

那一时期长春街头经常出现一些被遗弃的婴孩。这些不幸的孩子一个个饿得瘦骨嶙峋，有的已奄奄一息了。凡听到孩子们撕肠裂肚般啼哭的人，无不心碎。倘不是被内战逼得走投无路，天底下哪里会有丢弃自己亲生儿女不管的狠心父母？起初，我曾发动地方“慈善机关”收容这些孩子。后来又竭力动员军队眷属抱养，无奈被遗弃的孩子愈来愈多，有时每天竟多达近百名，这如何收容得过来？许多孩子就因此而死掉了。

大约在8月初旬，蒋介石先生在庐山上发来电令，让我将长春城内居民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守军压力。于是我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但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欲退又回不来，加上一些土匪乘机抢劫钱财食物，弄得百姓们惨状百出，终日哭号之声不绝，以

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据说长春解放时，在城东、南郊一带掩埋的尸体就有几万具。

长春本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此时城内外却是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人民遭受了一场亘古少有的浩劫！多少年来，每每追忆起长春围城时的惨状，我都不免心惊肉跳，尤其对长春人民当时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更感到万分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将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

遗憾的是，那时尽管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长春守军灭亡的命运已经不远了，而且内心更加后悔当初到东北来打这场内战，但是，那种愚忠愚孝的封建意识却继续左右着我的思想。我错误地认为，不论国民党多么腐败，也不论局势多么险恶，我毕竟跟着蒋先生干了几十年，惟有尽自己力量，挣扎到底，才能保全军人的“气节”，对蒋先生也算是问心无愧。所以，我的心情虽然极度痛苦、绝望，却仍然强作镇静，拼命支撑，丝毫没有改变坚守到底的决心。由于我的这种顽固态度，使长春人民蒙受的灾难又延续了一个时期，这是我后来思之而痛悔不已的。

十二 放下武器，退出内战

1948年9月中旬，东北解放军经精心筹划和充分准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自9月12日起，解放军各路大军云集北宁路，连续猛袭北宁路锦州至唐山段各点的国民党军队，义县至锦州的陆路交通亦被切断，由此揭开了这场决定国共两党在东北胜负命运的重大决战的序幕。

大约在9月底前后，解放军相继攻克昌黎、北戴河、绥中、兴城、义县等城，随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合围锦州。

解放军这一着棋的确非常厉害，因为锦州是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门户，是东北与关内联系的陆路要冲、咽喉要地。锦州一旦失守，沈阳和长春的国民党军队将退路断绝，顿成瓮中之鳖，必遭覆没。故蒋介石先生闻讯大惊，慌忙于9月底、10月初由南京先后飞抵北平、沈阳，亲自督促、指挥驻华北和沈阳的大军驰援锦州。

本来在9月初，东北“剿总”曾有由沈阳派出几个军的兵力北上四平街接应长春守军突围之议，使我在绝望之中有了一丝希望，乃至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我这一点点希望也成为泡影了。我很清楚，目前等待援军已无可能，再拖下去，只有全军饿死、困死，遂决心乘解放军主力南下

锦州，孤注一掷，拼死向沈阳突围。

打定主意后，我立即召集新7军军长李鸿将军、副军长史说将军（史氏此时已升副军长一职，新38师师长由陈鸣人接任）和第60军军长曾泽生将军等人开会，研究了当前局势。李、曾等人皆无突围信心，经我再三坚持，始勉强同意抽调新7军新38师和第60军182师，向长春西北方向先作试探性突围。我们计划先收复大房身机场，然后在飞机接应下全军突围。

10月3日，天刚亮，新38师首先打响，激烈的枪炮声霎时响彻西郊。战斗持续了二个多小时后，我接到李鸿军长打来的电话：“司令官，不行啊，共军好像已有了准备，我们攻不上去呀！”我严厉地对他说：“你要有信心，不要怕牺牲，一定要打出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后撤！”言毕，我放下听筒，驱车赶往新38师师部，亲自指挥督战。在该师师部时，李鸿将军和新38师师长陈鸣人告诉我，他们自清晨以来已发动了几次进攻，但因解放军火力强大，都被打退了，至今阵地未能向前移动一步。我听后很生气，认为是他们缺乏信心，指挥不力所致，命他们重新调整兵力，组成几支梯队，轮番向解放军阵地进攻。同时，命182师也加入战斗。

过了片刻，新38师和182师攻击部队在炮兵支援下再度发起冲锋，战况十分激烈。我通过望远镜观察到，尽管我军炮火很猛，但步兵终因饥饿过久，体力不济，运动很慢。有几次突击部队好不容易接近解放军阵地前沿，马上又解放军反击下来，伤亡很大。李鸿将军在旁急得不住地唉

声叹气，我装作没听见，仍然下令不停地进攻。战至中午，阵地也仅向前推进了几里地，此后便再也打不动了。此刻，我才痛切地感到，军心已彻底涣散，士兵们已不能、也不肯卖力气打仗了，为此心中焦躁万分。

4日下午，我请曾泽生将军到兵团司令部，命他再由第60军暂21师派出一团兵力助攻。曾将军垂首无语，半晌才抬头恳切地说：“桂公，现在部队士气非常低落，城外共军有一个纵队、六个独立师的兵力，围得很紧，我们根本突不出去，这样打下去只能徒遭伤亡。”我有些生气地反问：“那么你说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坐以待毙？”曾氏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沮丧地说：“桂公一意要打就打吧，反正我们60军是没有办法了。”看见他无精打采的样子，我虽恼火，却还是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之类的话劝慰了他一番。他返第60军军部不久，勉强增派了一团兵力，也只是摆摆

1949年12月15日，曾泽生将军率部起义，为和平解放长春作出重大贡献。

太不人道了。所以，一直到长春解放，我都没有想过要动用毒气。

7日下午，解放军发起一次反击，第60军方面一度吃紧，我偕李鸿将军闻讯匆匆赶至设在一家面粉厂内的第60军临时军部。我们刚一进门，曾泽生将军便气冲冲地朝我大声说道：“司令官，弟兄们都饿着肚子，实在打不下去了。这几天伤亡这么大，再打就要把队伍拼光了。请您下令无论如何要在今晚把部队撤回来罢！”我也知道突围没有多大希望，可又不甘心就此作罢，便扭头问李鸿将军：“李军长，你的意见如何？”李氏早就没有突围信心，只是不敢言明，此刻见曾将军已先公开表示异议，也连忙附和道：“桂公，看来现在突围是不行了，先把部队撤回来再说吧！”我见两位军长都坚决表示不愿再突围，再固执己见恐出意外，遂长叹一声，有气无力地下达了撤退命令。我知道，此番突不出去，也就再无生机了。那时候我非常顽固，根本没有想到还有起义或投诚这一条生路可走。

10月10日中午，几架飞机突然飞临长春上空盘旋，我意识到可能是上级送来紧急命令，立即摇电话给杨友梅将军，要他派人联络，果然没多久，杨将军便急匆匆地来到我的住处，报告说：“司令官，空军空投下来紧急公函，请过目。”我连忙接过一看，原来是蒋介石先生分别写给我和李鸿、曾泽生两位将军的亲笔信，信的详细内容我已记不清楚了，大意是说：“日前共军主力正在猛攻锦州，东北局势十分不利，长春的空投物资亦难维持。望吾弟接信后迅速率部经四平街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转进。行动之日将派

飞机掩护，沈阳方面亦有部队在路上接应，等等。

我阅过信后，马上通知新7军和第60军军长到我的住所开会。这时李鸿将军突然患起伤寒症，高烧不退，军务由副军长史说将军代理。不一会儿，曾、史二人即先后来到。两人看过信，都坐在那里默默无语，我问道：“总统命令我们突围，二位看看怎么办好？”曾将军连连摇头苦笑道：“总统下命令容易，真正突围谈何容易？现在城外共军兵力雄厚，而我军是兵无斗志，根本突不出去的。”“就是突出去，这七、八百里地，中间没有一个‘国军’，官兵又都腿脚浮肿，不要说打仗，就是光走路都成问题呀！”史说将军一反往常活泼乐观的样子，在一旁愁眉苦脸地补充道。我们又反复密商了许久，仍无结果，我只好将会议结果电复给蒋先生。

10月15日，解放军终于攻克锦州，全歼守军十五万人。这样，整个东北国民党军队的陆上退路完全被切断了。

在锦州失守的次日上午（即10月16日），蒋先生再次派飞机空投下来一道措辞十分严厉的“国防部代电”。电文如下：

“长春郑副总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酉灰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行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般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本删日已来沈指挥，希知照。中正手启。”

随“代电”还有蒋先生给我的又一封亲笔信，内容与

电令大致相同，仅是语气稍缓和些，他说已派 207 师去清原接应，自己也在沈阳停留三日，要我务必果断地率长春守军突围，否则将不能等候矣。

我的心被眼前的一切搅得异常烦乱，明明知道突围已不可能，但作为军人又不能不服从命令，心情真是痛苦极了。最后，我心一横：突围是死，不突围亦死，横竖是死，干脆拼死向外突吧，死了也能落个国民党“忠臣”的名声。

想到这里，我命副官通知曾泽生将军和史说将军火速到我的住所开会。史将军接到电话马上就赶来了，曾将军却推说正在吃饭，支吾着不肯来。我一把夺过电话，焦急地说：“曾军长，我有要事相商，你马上来一趟！”“这……我刚吃饭，等一会儿去好吧？”电话筒里传来曾氏犹疑的声调。“不行，事情非常紧急，你得马上来！”我仍坚持。“那——好吧，我五分钟以后赶到，可以吧？”他犹犹豫豫地答应了。

又过了大约十分钟，曾泽生将军才赶到，神色显得有些慌张，一反常态。我虽有点诧异，但并未料到会发生什么意外。

“桂公召我什么事，这么急？”曾氏一面点头与史说、杨友梅二将军致意，一面略微拘束地在我斜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我顺手将茶几上的电令和蒋先生的亲笔信递给他，并告诉他：“昨天锦州已经消息断绝，情况不明了，唉！”也许是因为那一向吸烟过多，再加上着急和难过，我的嗓子像被什么卡住了，说话费力，声音也嘶哑得很。

曾泽生将军拿过电报和蒋先生的信，很快地看了一遍，

又放回原处，问道：“司令官准备怎么办？”“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按命令突围，我决定今晚就开始行动，明天四面出击，后天（18日）就突围。你们看如何？”我情绪激动地站起来，一边来回踱步，一边以不容置否的坚决口气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这个时候，我最担心眼前的这两位将领不肯同我一道突围。

曾将军望望史说将军，又望望我，用很低的音调说：“我没有意见。不过，部队上气非常低落，突围，第60军没有什么希望。”“新7军的情况也差不多，这些桂公很清楚。如果桂公决定突围，我们服从。”史说将军在一旁轻轻抚着我养的一只小花猫，也慢吞吞地表示了态。

我沉默了一会儿，没有理会他们的勉强态度，又说：“好吧，突围的事就这样决定了，你们先去准备一下，下午再开会拟定突围计划。”“我们打算从哪条路走呢？”曾将军仿佛不放心似地插上一句，我想了想，心事重重地说。“还是从伊通、双阳这条线走吧，……实在突不出去，就拉上长白山打游击。”曾将军苦笑道：“桂公还真打算在共产党的天下打游击么？”我重重地叹了口气，没有作声。其实，我心里同他们一样清楚，突围，仅仅是为了服从命令，其结果无非是战死在城郊。所谓到长白山上去打游击的说法，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实际上是根本做不到的。

大家又默坐了片刻，曾将军首先起身告辞说：“下午开会讨论如何行动，我派徐参谋长来参加，他可以代表我决定一切。情况我已了解，一切听从司令官决定。”说毕，即匆匆离去。史说将军也随即返回新7军军部去了。

我没有料到，此时我的内部正面临着严重的分化，曾泽生将军已派人出城与解放军联系，正式决定率第60军起义了。许多年后，记得有一次曾将军笑着对我说：“那次桂公召我去开会，催得很急，我心里好紧张，还以为您发觉了60军准备起义的事，要将我扣起来呢！”实际上，当时我和新7军的将领对此事一无所知，完全被蒙在鼓里了。

当日午后一时，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新7军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第60军参谋长徐树民相继按时来到我的住所开会。

会议的气氛十分沉闷。我首先郑重宣读了蒋介石先生的电令，然后询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众人面面相觑，默然无言。末了，史说将军说：“李鸿军长正病着，我们也提不出什么意见，还是请司令官做出决定吧！”第60军徐参谋长也在一旁这样附和着。

我考虑了一下，站起来很忧郁地表示了我的决心：“总统既然决心要我们撤退，我们就只好走吧！”

随后，杨友梅将军取出地图，与大家一起伏在桌子上研究起撤退的路线、时间和部署。经过大约两三个小时的反复商讨，才算把突围的详细计划制定下来了。

当时我们的计划是：决定将长春守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清原转移。左纵队由第60军担任，先沿吉长公路向永吉疾进，待先头师通过岔路河后，先头师即任纵队后卫转向永吉、磐石铁路线，跟随军主力向海龙、清原前进；右纵队由新7军担任，先派新38师向长春南郊大屯方向佯攻，打破缺口后即掩护暂61师向南占领伊通伊巴当，担任

右纵队侧翼掩护。然后新 38 师作为纵队先头师，再向东南经双阳向烟筒山、磐山铁路线前进。暂 56 师先任长春守军的后卫，固守长春城防工事，俟新 38 师撤出长春后，改任后卫，随军主力前进。暂 61 师俟暂 56 师抵达双阳后，即向双阳转进，担任右纵队后卫，掩护兵团退却。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随右纵队行动。

右纵队新 38 师行动时间定在当日午夜十二时，暂 61 师于次日凌晨二时前向伊通方向疾进；左纵队亦在午夜同时突围。

一切商定之后，我即宣布散会，要众人马上回去做好夜间突围准备。

史、龙、徐三人分别离去后，我和杨友梅将军又驱车来到兵团司令部，亲自部署司令部人员及直属部队的突围事宜。事毕回到柳条路我的住所时，天已黑了。我草草地用过晚饭，便闷闷地躺在卧室床上不停地吸烟。突围的事终于决定下来，似乎使我松了一口气，但紧接着一种空虚、绝望的心情又袭上心头。我知道突围是凶多吉少，倘突不出去，我只有杀身成仁。想到我不过活到 45 岁，就将以这样的结局了结了自己的一生，特别是还有十万袍泽，十万更年轻的生命要随我一同走向死亡之地，心里感到阵阵悲凉。这样想着想着，竟不觉昏然睡去。

那一晚新 7 军的几位将领却迟迟未睡，大家知道明天必死无疑，心都麻木了。陈鸣人、邓士富、张炳言等几位师长跑到副军长史说将军房里搓麻将，很晚还赖着不走，直到最后史将军发起急来，才把他们赶走。

大约晚十时许，我床头的电话突然铃声大作，我一抓起电话听筒，里边便传来第60军暂52师副师长欧阳午急促的声音：“喂、喂！司令官吗？60军已经决定起义了，今夜就行动！”我刚想探问个究竟，对方却把电话挂掉了。放下电话，我心头一阵紧张，心想第60军若真的起义，让解放军占领了长春半个防区，那情况就不堪设想了。但转念一想，暂52师师长李嵩、副师长欧阳午等人素来与曾泽生将军等滇系将领不和，是否是有意夸大其事？此事现在又不便过于声张，免得引起混乱，影响突围。于是，我又立即给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将军打了个电话，请他设法了解一下第60军的动向。也许是那一天过于紧张、疲倦了，打过电话我又酣然入睡。约摸午夜时分，我在睡梦中突然被人推醒，睁眼一看，新7军副军长史说将军和参谋长龙国钧、新38师师长陈鸣人正站在我的床前，一脸紧张的神色。我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忙问：“你们来干什么？”龙参谋长抢先急切地说：“司令官，60军的情况可能有变化，现在已失去电话联系了！”“什么？！”我的心猛一沉，一骨碌披衣坐起来，迫不及待地听取了史、龙等三人的详细汇报。

原来在半小时以前，新7军军部附近突然遭到乱枪袭击，经派出该军特务连部队搜查，发现中央大街东半侧的警戒部队已加强了兵力，且士兵说话很多是朝鲜语，先前的一阵乱枪便是大街东侧防区街心地堡内的守兵发射的，史、龙二人曾打电话给第60军军部接洽，但电话总机称，与第60军的直达电话线，在三个小时以前就拆除了，因此无法联系。

听了上述情况介绍，我始感到事情已发生突变，看来几小时以前暂 52 师副师长欧阳午报告的情况并非无中生有。我随即拿起电话听筒要第 60 军军长曾泽生将军讲话，但等了很久没人接。再要第 60 军徐参谋长的电话，也无人接，这更证实了关于第 60 军起义的说法。我无力地放下话筒，重重地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对史说等人说：“算了吧，他们（指第 60 军）要怎么干，就由他们干去吧！”“那突围的事情怎么办？”史说将军忧心忡忡地问。我考虑在这种情况下突围已不可能，遂命令立即中止突围行动，将已开始调动的部队撤回原防，并迅速向第 60 军方向派出警戒。史说等人走后，我又急将第 60 军的上述情况电告给沈阳卫立煌将军，请示今后行动机宜。

17 日拂晓前，我又多次向第 60 军方面摇电话，最后好不容易接通了，但接电话的却不是曾泽生将军，那人在电话里粗声大气地问：“你是谁，要干什么？”我平静地说：“我是兵团司令官，你是谁？请曾军长同我讲话。”过了好一会儿，听筒里才又传来另一个人的声音，语气比刚才那位缓和多了：“司令官，我是 60 军新闻处长。曾军长命我转告您，60 军已决定光荣起义。如果司令官赞成我们的主张，欢迎您和我们一同起义；如果您不赞成，我们也不勉强，就各行其是好了。”我仍要求与曾将军直接通话，但被拒绝了。我刚懊丧地放下听筒，又接到一向与我和李鸿、史说等人十分亲近的天津《民国日报》青年特派记者杨治兴打来的电话，他情绪很激动地说：“桂公，60 军已经起义，曾军长刚刚给我打来电话，要我转告您，说他决不向您开第一枪，

希望您带头率大家举行反蒋起义。您看怎么办？”末了，杨氏又一语双关地加上一句：“桂公，您要尽快拿定主意啊！”我心里烦躁极了，只淡淡地说了一句：“知道了。”便放下了听筒。

天亮后，杨友梅、史说、龙国钧等几位新7军将领和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先生、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等，又相继来到我的住所打探消息。第60军起义的确切消息使人家万分震惊，众人在一起七嘴八舌地商议对策。正说话间，忽报一名第60军军官前来送信，我即命请进来。那人进来后稍微环视了一下室内，然后举手向我行了个礼，自称是第60军政工处长，特地奉命前来送曾军长的一封信，言毕将信递上。我抽出一看，果然是曾泽生将军写给我的一封字迹十分工整的亲笔信。信中说：

“桂庭司令官钧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之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

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

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
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
甚，地方幸甚。竭诚奉达，敬候赐复，并祝
戎绥！

曾泽生 敬启”

阅过曾将军这封言辞恳切的信，我的心情十分复杂。从道理上讲，我不能不暗暗承认他信中说的都是事实。自己在国民党内做事多年，特别是在从印缅回国后的几年中，亲眼看到国统区内的各种腐败现象比比皆是，日甚一日，对此曾一直深感不满和忧虑。同时，在战场上同共产党打了几年交道，也了解到对方的许多优点，如共产党人作风清廉，处处为百姓着想，深受人民拥护，军队中官兵团结，打仗有办法等，心中不乏钦佩之意。但此刻若要我同曾将军一样起义却是困难的。因为我跟随蒋介石先生几十年，多重关系将我们系在一起：在黄埔军校中他是我的师长，在军队中他是我的最高统帅，在国民党内他是我的领袖。我作为他的亲信将领，一向受其信任和器重，对于这种“知遇”之恩，我无时不铭刻肺腑，唯恐在这最后关头因临阵起义而落下个“卖主求荣”的坏名，故宁愿死心塌地地顽抗到底。

想到这里，我把曾将军的信放到桌上，冷冷地说：“信我留下，就恕不作复了。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来人闻言没再表示什么，转身退出去了。

第60军信使走后，房内几个人拿起曾氏的信互相传递

着阅读，没有人讲话。半晌，崔垂言先生对我说：“桂公，您是否再与曾军长通一次电话，请他同意我们派人去同他面谈一下，看看事情还有无可挽回的余地？”我想了想，同意了这个建议，叫副官接通了电话。不一会儿，对方表示曾军长愿意同司令官的代表会面，并提出去第60军的代表所乘的车辆前要插一面小黄旗，以便通过岗哨。我随即指定杨友梅将军和崔垂言、尚传道两位先生作为我的代表去与曾将军商谈。他们临走前，我想起曾将军在围城期间对尚传道先生有些不满，故还特地叮嘱了他几句。

过了大约不到一小时，杨友梅等三人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告诉我曾将军的态度很坚定，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并说曾氏还再次劝我们认清大势，尽早有所抉择。至此，我对促使曾将军回心转意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了，心情十分痛苦，但并未动摇顽抗到底的决心。我命史说、龙国钧二将军先回新7军军部，召开各部队长会议，讨论突围办法；又吩咐崔垂言和尚传道二位先生将省市政府的重要档案焚毁，做好最后破釜沉舟的准备；同时，由于第60军起义后，设在原伪满国务院的兵团司令部和我在柳条路的住所已不安全，我下令暂时进驻中央银行，再作进一步突围的部署。

正忙碌间，记者杨治兴心事重重地来我的住所探望，并说有要事对我讲。在我的卧房内坐定后，他先犹豫了一番，方鼓起勇气说：“桂公，您一向待我亲如子侄，现在我不能不向您进一忠言。目前长春的局势已很难挽回，下面都不肯打了，再打也没什么希望，请您还是早做妥善主张吧。”

我叹了口气说：“这些情况我都了解，但目前我只有打下去，没有别的路可走。”杨氏有些激动地说：“桂公，我大胆地说一句，您不是以前也同我讲过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得人心。现在您却执意要为这样一个政权打到底，就是战死了又能怎样？我看还是退出内战吧，免得再做无谓牺牲。”杨氏的话确实刺痛了我，我何尝不愿活下去，为国家、民族做一些贡献？但一想到这样就意味着背叛蒋介石先生，我的心又强硬起来，遂压抑着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强作镇静地对他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不愿意听这些话。”不过，看到眼前的这位年仅20余岁的年轻人，也许会同我一道死在突围的路上，心中又很不忍。过了一会儿，我酸楚地对他说：“小杨啊，跟着我走是浑水，跟着共产党是清水，你与我不同，还是留下吧，我让人给你留下几袋米。”杨氏闻言痛哭失声，哽咽着说：“这个时候我不能走，我陪您去中央银行。”说毕，起身随我一起乘车前往中央银行大楼。

当日下午，我接到沈阳方面发来的电令，指示我于18日上午率部从第60军防地向外突围，届时将派飞机轰炸掩护。我立即在中央银行召开秘密会议，研究下一步突围部署。参加会议的除杨友梅、史说、龙国钧等几位将领外，还有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先生、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将军、军统长春站站长项迺光先生（后去台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以及蒋介石先生于5月间派来的两名督战官李克廷、肖树瑶等人。

我首先在会上宣读了电令，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等了半天，在座的新7军将领们都默默无言，惟有崔垂言、项

迺光等人坚持要突围。我知道突围关键要看实际带兵的将领态度，遂转向史说将军问道：“史副军长，突围的事你看怎么办好？”“现在突围是突不出去的，不过是又要无辜地死伤上几万人罢了。”史氏无精打采地答道。我尚未及答话，项迺光先生忽然奔到史将军面前，用手指着他的脸庞厉声责问：“我们必须突围，拖也要把队伍拖到长白山去打游击。难道新7军就这样无用吗？！”史氏闻言满面愠色地站起来，拂袖而去。他一走，会自然开不成了，只得不欢而散。

晚上，尚传道先生又来看我，我留他在司令部一起吃晚饭。因为彼此心情都很沉重，谁也不愿多讲话。饭后，大约七时许，曾泽生将军突然打来电话，我赶紧拿过听筒，他却只讲了一句：“有人同你讲话。”接着，一位自称姓刘的陌生人在电话中说道：“我是解放军的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不必再作无益的牺牲。”我愤愤地答道：“既然失败了，除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说毕将听筒重重地往电话机上一搁，表示回绝。

但是，和我一样打算负隅顽抗的人毕竟是愈来愈少了。17日夜，记者杨治兴又来到史说将军家探望，谈到长春的局势和今后的打算，史说将军叹息不已。杨氏趁机进言：“日前突围和战守都没有前途。您是否有意率部声明退出内战，与解放军商议停战？”史氏与其他将领本已不想再打，只是碍于我的反对而不敢做主，故闻言忙问：“桂公意下如何？”杨氏急于促成和平，乃根据我平素私下对国民党腐败

不满的一些言论佯称：“桂公也有此意，不过依他的身份怎么好讲呢？”史说将军以为是我授意杨氏来传递信息，不由大喜过望，说：“倘桂公同意，一切就好办了！”第二天一早，他与龙国钧将军商议，决定派新7军炮兵指挥官王及人、新闻处长杨天挺、暂61师第2团团长姚凤翔三人出城与解放军谈判。

新7军与解放军接洽的事情，我当时完全被蒙在鼓里，丝毫不知晓，以后还为此与史、龙二人间有些误会。1962年，我与史说将军在上海谈起这段往事，彼此才弄清记者杨治兴从中“假传圣旨”的这段缘由，不禁相对大笑，这是后话。

18日晨，沈阳方向如期飞来一队轰炸机，在市区上空盘旋。稍顷，从飞机上又传达了催促突围的命令，我只好说部队未准备就绪，请求延期突围。这时，机上指挥官报告说，市区东半部正有大批部队向城外开出，问我是什么部队。我回答说可能就是第60军部队。机上人员立即要求进行轰炸，我说：“算了吧，那些以前都是自己的人，况现在轰炸已无意义，徒使老百姓遭殃，还是停止轰炸罢。”于是，这队飞机在南关一带盲目地丢下几枚炸弹，便悻悻地飞去了。

18日下午，我万分焦虑地来到新7军军部，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督促布置突围事宜。这时李鸿将军已从家移居到军部，我特地先去看了看他，他的病仍然很重，连说话都很困难。左右的人告诉我，李氏近日来常蒙头痛哭，情绪非常悲观，我听了心里也很难过，只好说了几句不着

边际的话安慰他，随后便匆匆来到隔壁的小会议室主持开会。

会上，我依然坚决主张突围，但大家都哭丧着脸，闷在那里不说话。我急了，再三催促史说将军发表意见。他只说：“目下官兵饿得腿脚浮肿，行军困难，况且途中还有共军拦截，这些情况您是深知的。”之后，便垂着头再也不肯讲话了，屋内的气氛一时十分尴尬。又过了很长时间，还是其中一位与我私谊很深的老部下、暂61师师长邓士富大胆地站起来说：“目前情况，突围已不可能，建议司令官暂时维持现状，再徐图别策吧。”我见会议也研究不出什么别的结果，只得同意他的意见，宣布散会。

会散后，史、龙二人坚意要留我在新7军军部过夜，我心里一惊，心想他们虽是我在印缅作战时的老部下，但在此危急关头，莫非要挟持我向解放军投诚？这样岂不坏了我的“名声”？我愈想愈怕，一面坚辞不肯，一面头也不回地冲门而去。事后才知道，那时新7军的将领们都以为我内心里已有放下武器之意，担心我在兵团司令部为特务包围，不安全，故想将我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中，并无恶意，是我误解了他们的一番好意。

在返回兵团司令部的路上，我的心情痛苦、绝望到了极点。心想自己戎马半生，参加过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经历了无数战阵，今日竟落到如此下场，连多年相随的老部下也同我离心离德了，看来真是“气数”将尽。我意识到现在突围不成，守亦不成，惟有以杀身成仁来保全自己的军人“气节”了，遂下了自戕的决心。那时，我根本没

有认识到自己这样死心塌地地维护一个早已失去民心、注定要失败的腐朽政权是极端错误的，更没有想到在这个紧要关头，应当勇敢地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决裂，走向人民，走向光明。相反却要以自戕来愚忠于“党国”，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住天地、良心。今日想来，这些想法真是顽固可笑到了极点。

我在迷惘和痛苦中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我尚未起床，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将军和两名督战官轻轻走进我的卧室。杨将军侧身坐在床沿上，声音低低地问：“桂公，桂公！您睡醒了？”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没有动弹。杨将军怯生生地说：“刚才接到新7军史副军长和龙参谋长电话，他们已经与解放军方面接洽，决定放下武器了，解放军同意保证司令官以下全体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李军长和史副军长他们都希望由您来率领大家行动，解放军方面也再三表示了这个意思。您看我们……”说到这里，他不往下说了，但声调里充满了期待。新7军决定投诚，已在我的意料之中，但一旦将成为事实，仍使我在精神上遭受巨大冲击。“完了，一切都彻底完了！”我无力地躺在床上，这样悲哀地想着。

杨将军见我久久不言语，坐在床边有些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卧室门外有人轻轻地同我的卫士讲话，杨将军闻声快步走了出去。稍顷又进来附在我耳边轻轻说道：“司令官，龙参谋长有事来见你。”见我没有反应，他又重复了一遍。过了约两分钟。我才有气无力地问：“龙参谋长有什么事？”龙氏平静地说：“现在军部正在开营级以上干

部会议，希望司令官去主持一下。”“你们李军长呢？史副军长呢？他们为什么不亲自主持？”我有些气恼地问。龙氏答：“李军长正在生病，无法主持会议。史副军长现在主持会，但有些重大问题无法决定。倘若司令官亲自参加，问题就容易解决些。”听了龙氏的话，我联想起昨晚他们执意让我在新7军军部留宿的情景，不禁恨恨地想到：“哼！果然是想挟持我。”我愈想愈气，再也抑制不住埋在胸中的痛苦和怨恨，猛地撑起半身，指着龙氏厉声骂到：“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为何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呢！”屋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众人从未看到过我如此责骂部属，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我也自觉出言太重，重重地叹了口气，又颓然倒身躺在床上。龙将军怔怔地站了一会儿，怀着满腹委屈和失望返回新7军军部去了。

19日上午，新7军全体官兵自动放下了武器。在这前后，包括地方保安部队在内的国民党驻长春的各部队也相继向解放军集体投诚。只有兵团特务团还据守在中央银行大楼内抵抗，成了解放军重重包围中的一个小小的孤岛。

此时真正是山穷水尽了。我见大势已去，遂将全部情况向东北“剿总”做了汇报，没多久，我接到刚刚被蒋先生由徐州“剿总”重新派到东北收拾残局的杜聿明将军打来的电报，他拟请蒋先生派直升飞机接我出去，问有无降落地点。我怀着既感激又沉痛的心情电复他：“现在已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离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到了这时，我还是没有改变“宁可战死，不愿投降”的顽固态度。

20日这一天异乎寻常地相对平静，解放军并未像我预料的那样大举攻打中央银行大楼。实际上，杨友梅将军和我身边的高级幕僚们已背着我在暗地里与解放军接洽上了，那时我呆在房间内心灰意冷，万念俱废，随时准备殉职，并未注意到他们的活动。

10月20日夜十一时，我给蒋先生拍发了最后一封诀别电报：

十月十九日下午七时亲电谨呈，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及司令部与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十月十九日竟日激战，毙伤匪三百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前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本晨迄午后五时，仅有零星战斗。薄暮以后，匪实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窜占我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刻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力。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已。职当凛遵训诲，克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惟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职郑洞国十月二十日二十三时亲印。

21日凌晨，中央银行大楼外突然响起剧烈的枪声，我

尚以为是解放军向我的司令部发起最后攻击，觉得该是自己“成仁”的时候了，遂身着戎装，平躺于床上，伸手至枕下欲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枪自戕。岂知摸了又摸，手枪居然不见了。原来左右已发觉我的神情异常，预先就将武器寻出收藏起来了。我生怕再稍迟一刻便作了解放军的俘虏，忙慌慌张张地起来在室内到处搜寻任何可以了结自己生命的器械。这时，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卫队长文健和四名卫士闻声拥入，呼喊着我死死抱住。住在邻室的我的侄子、时任吉林省政府秘书处处长的郑安凡，也跑了进来，直挺挺地跪在地上连声哀求：“二叔，不能啊，您可千万莫走绝路！”言毕大哭。我恨恨地跌足叹气，颓丧地倒地床上。稍顷，杨友梅将军带着一些幕僚匆匆走进房间，他含泪道：“桂公，事情已到了最后关头，请您赶快下去主持大计！”然后命人不由分说地将我从床上扶起，拥向楼下。

来到一楼大厅，我猛然怔住了，原来大厅内外已布满了解放军。再看身边，四名卫士紧紧地环绕在我的身后，惟恐我再出意外，杨友梅将军等人也团团围着我，都用满含期待的眼神注视着我，我一切都明白了，面对这木已成舟的事实，我只得勉强同意放下武器，听候处理。

事后始知，杨友梅将军和司令部的幕僚们，先已通过了解放军秘密接洽，悄悄迎了解放军的代表及少数部队。他们计议，朝天开枪，假意抵抗，造成猝不及防、兵临司令部的现实，促我与之共同走向光明。这样，既避免弃我于不顾，又不叫我过于难过，巧妙地从我死亡线上把我救了出来，真是煞费苦心！后来每忆及此事，我都由衷地感激

共产党的伟大政策和部属们的这番安排。

当日天大亮后，我带着已经放下武器的兵团直属部队出城，途中恰巧与随解放军大队进城的解放军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将军和政委萧华将军相遇。萧华将军立即停下车子，走过来热情地同我讲话，没有一点胜利者的架子和骄矜之色，使我冰冷的心里，油然而生起一股钦敬之意。

晚上，萧劲光将军和萧华将军在位于长春郊区四家子的司令部里设下丰盛的筵席款待我。尽管主人招待得非常客气、周到，但由于我当时的思想仍甚顽固，且心绪更坏，故只低头喝酒，很少讲话。萧劲光和萧华二位将军虽然看出我不愉快，似有敌意，却还是不停地给我斟酒夹菜，和气得很。酒过数巡之后，我才开口对二位将军说：“我在国民党里搞了二十几年，现在失败了，当然听凭处理；至于部下官兵，如果有愿意回家的，希望能让他们回去。”萧华将军和蔼地答复说：“关于这些我们党有政策规定，请郑将军放心，要回家的人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回家，愿意留下的也一定给予妥善的安置。”“既然过来了，大家都是一样的，都还可以为人民服务嘛。郑将军今后的打算如何？是愿意回家还是愿意留下？”萧劲光将军也在一旁微笑着问道。我知道他们的态度十分诚挚、友善，没有丝毫恶意，但因失败而为死灰般的情绪萦绕着内心的我，却还固执地想做“失败中的英雄”，不肯向共产党人低头，所以很坚决地向他们表示，什么事都不想做，只想当个老百姓，并且生硬地说了二条：一不去广播、登报；二不参加公开的宴会。二位将军笑了笑，毫不介意，对我的两点“要求”，也都爽

然应之。筵席快结束时，二位将军委婉地提出：“你不愿工作，是否愿意到后方哈尔滨去多看一看，休息休息，或者学习一段时间，请任意选择。”我想了想，觉得自己对解放区一向十分隔膜，看一看也好，还可以研究一下共产党究竟为什么能够得人心，打胜仗，自己输也输个明白。于是，我就点头同意了。

我在解放军的司令部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便离开了这座战火刚刚熄灭的城市，经永吉前往哈尔滨解放区。从此，开始了我人生历程中的一个新的转折！